德州学院
DEZHOU UNIVERSITY

高教发展资讯

2026年第5期（总第41期）

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专题



发展规划处 编印
2026年11月5日

高教发展资讯

——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专题

2026 年第 5 期（总第 41 期）　　主办：发展规划处

本 期 目 录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 ... 1
2. 山东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 7
3. 以“双优”工程驱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双优”工程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 24
4. 锚定“双优”目标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 32
5. “双优”建设要实现三个转变 ... 36
6. 应用型高校对接产业链与应用链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 40
7. “双优”工程：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导向 ... 57
8. “双优”评价模式构建的逻辑机理与实践方略 ... 73
9. 推动应用型高校向“双优”目标迈进 ... 88
10. “双优”建设重构应用型本科价值坐标 ... 93
11. 以“双优”建设引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发展 ... 97
12. “双优”工程视域里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几个核心问题 ... 102
13. 破局“中部塌陷”：应用型本科“双优”建设的身份重构与路径突围 122
14. 关于支持浙江万里学院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行动方案 ... 13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

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以构建企业主导、各主体协同的产学研融通创新体系为重点，推动全链条贯通、全领域覆盖、全要素融通、全方位保障，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新格局，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支撑。

工作中要做到：坚持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新特点，加强系统谋划和一体推进；坚持统筹科技供给和需求牵引，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坚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激励创新的市场机制，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坚持以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坚决破除阻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的思想观念和制度障碍。

二、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无缝对接

（一）健全创新统筹机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战略规划、重大任务、政策措施的统筹协调。按照“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要求，在重点前沿领域统筹科技和产业发展重大政策、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加强科技、产业、金融、教育、人才等政策协同。面向地方、行业开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监测评估，把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和产业创新水平作为重点内容。

（二）改革任务组织模式。强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产业应用导向，常态化征集企业需求，在指南编制、立项评审、项目验收中，合理增加来自企业和创业投资机构的专家数量，推动科技界、产业界、用户等多方参与。健全企业牵头项目的管理规定，完善“揭榜挂帅”、“业主制”等组织方式和“里程碑”管理、分阶段拨款等资助方式。健全“应用考核技术、市场考核产品”的项目验收机制，加强研发目标和产业化目标一体考核。推动国家重大工程和产业发展专项同步部署科研任务，明确科技创新目标，健全组织实施机制。

（三）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途径。健全研用一体的成果转化应用机制，产业应用目标明确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原则上由企业牵头实施并主导成果转化。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设立技术转移机构或岗位，强化知识产权、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等专业化服务，通过技术转让、许可、作价投资等方式加快成果应用。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鼓励科技成果完成人全过程参与成果转化，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健全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促进专业化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发展，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

（四）强化场景驱动创新。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行动，加大场景培育和开放力度。支持地方在政务服务、智慧

城市、乡村建设等领域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加强技术、场景等供需信息汇集发布。强化场景开放协同共享。

三、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五）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等工程，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强化基础零部件及基础元器件攻关，突破关键基础软件，攻克关键基础材料，加强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研发。

（六）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底层技术研发，开展颠覆性技术挖掘甄别，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实施产业创新工程，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前沿领域，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加快推进前沿技术产业化商业化，培育形成未来产业。

（七）以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速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强种业、农机装备等科研攻关，加快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促进科技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

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

（八）全面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完善企业常态化参与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制定机制。推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试点向民营企业开放，扩大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范围和规模。鼓励国有企业加快建立独立核算、免于增值保值考核、容错纠错的研发准备金制度。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支持企业牵头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国家科学数据中心等向企业开放制度。加大各类科技人才计划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强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建设。

（九）加快培育壮大科技企业。优化科技领军企业培育机制。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优机制。加快培育科技型初创企业，完善创业孵化、投融资等服务保障。深化大中小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融通创新，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应用场景和供应链，先试首用中小企业创新产品。

（十）加强创新主体协同联动。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创新链产业链链长作用，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增强体系化科技攻关能力。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与科技领军企业合作，注重从产业需求中凝练科学问题，强化战略性前瞻性技术攻关。鼓励企业参与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活动和人才培养。支持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共建研发机构、共设科研项目。

五、提高创新资源统筹配置效能

（十一）促进科技、产业、

金融良性循环。构建与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基金和国有资本创业投资基金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健全长周期考核、差异化监管和退出机制。推广“创新积分制”，强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量化评估。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

（十二）加强人才协同培养和使用。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完善科技、产业部门等多方参与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推广校企联合、工学交替和“双导师制”。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选派挂职、兼职和离岗创业政策，推广科技特派员等模式。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聘请企业创新人才担任产业导师、产业教授。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家。

（十三）建设融合创新平台。统筹布局国家新兴产业创新中心、国家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强化重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供给。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为新技术新产品产业化应用提供服务。支持转制科研院所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共性技术平台。支持地方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面向产业加强共性技术研发应用。

六、营造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

（十四）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破除不合理限制创新产品进入市场的制度障碍，在新业态新领域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探索开展承诺即入制。加强新技术应用监管，探索“沙盒监管”方式。推动健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法律法规，完善科技伦理制度规范。

（十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技术标准建设。强化商业秘密和新业态新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在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中健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全面实施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加强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专利布局。强化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标准布局，统筹设置标准研究任务和考核目标。全面加强前沿领域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研制和预标准研究。推动企业标准、团体标准提质增效。

（十六）完善创新激励和评价政策。健全创新活动全链条政策体系，落实科技创新税收优惠等政策。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等方面尽职免责机制，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提高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联合研发费用视同利润加回的比例。将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等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评估和科研人员评价的重要内容。

七、拓展深度融合的发展空间

（十七）支持地方开展深度融合先行先试。加强对地方科技和产业布局的宏观指导，引导各地立足禀赋优势锻造科技长板和产业特色。加强央地协同，健全中央与地方科技投入共担、重大任务联动实施机制。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加强跨区域协同创新。统筹发展各类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功能区，推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开展政策先行先试。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改革试点，深入实施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专项行动，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八、加强组织实施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抓好本意见贯彻落实。

（来源：2026 年 10 月 21 日新华社）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通知

鲁政发〔2026〕25 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现将《山东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6 年 10 月 20 日

（本文有删减）

山东省
教育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为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根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和《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主动应对学龄人口变化，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与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着力建设与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地位相匹配、与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相适应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力量。

到 2030 年，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更加健全，立德树人成效更加显著，各级各类教育资源布局、普及水平和发展质量持续优化提升，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更加有力，人才自主培养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大幅提升，智慧教育新形态和学习型社会基本形成，山东教育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教育强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二、以战略任务为统领，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一）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1. 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为主线，构建纵向贯通大中小学，横向融通学科、专业、教学、教材、管理的育人体系，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格局。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党的创新理论主课堂、实践育人大课堂和网络育人新课堂融合发力，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并进。建强山东高校网络思政中心，形成立体化校园网络育人矩阵。建设省级智慧思政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思政引领力提升。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强化宪法法治、国家安全教育，实施青少年学生法育工程。提高学校国防教育质量。坚持党、团、队一体化育人。

专栏 1　全环境立德树人品牌打造计划

推进完善立德树人机制试点工作，打造一批省市校立德树人特色品牌。常态长效推进好领导干部上讲台、先进人物进校园工作。全面开设新时代实践教育课程和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培育一批行业育人共同体，建好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到 2030 年，建设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实践育人省级基地 20 个、平台 100 个、研习点 1000 个，打造实践育人、网络素养、国家安全、心理健康省级优质课程案例各 100 个。

2. 落实新时代学校思政课课程方案。落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加快“大思政课”建设，推广“首课思政负责制”。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强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广“场馆里的思政课”、“行走的思政课”。完善分层分类思政队伍培训培养体系，严格思政课教师、高校辅导员配备。

专栏 2　思政课提质升级计划

开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全面进课程教材。建强用好党的创新理论教学案例库。开展好“五个共同”行动，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发展机制县（市、区）全覆盖。以省级思政课教学改革项目为引领，推进教学改革创新。建立突出教学优先的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

3. 加快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创新理论研究成果进课堂协同行动。建强全国、全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高质量建设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学部）。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研究与国际传播。遴选建设一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实施新型智库突破行动，构建多层次、宽领域新型智库体系。开展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项目，打造一批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专业学术期刊。

4. 推进健康学校建设。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 2 小时，推行“课间 15 分钟”，确保每个学生至少掌握 1 项体育技能。促进体教融合，深化校园足球综合改革，打造“省长杯”校园足球品牌赛事。加强医教协同，深入实施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推进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省级改革示范区建设，

开展远视储备监测和假性近视干预。实施学生脊柱健康管理行动和急救知识技能普及行动。提升学生营养健康素养，守牢校园食品安全底线。加强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实施美育浸润行动，深化学科美育教学改革。推动学校体育、美育场馆设施升级改造，实现急救设施设备配备全覆盖。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升行动，全面建成师生心理健康服务网络。提升学生医疗保险参保覆盖面，减轻学生就医负担。

5.深化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高质量建设全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实验区，推进全国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试点建设。推动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等公共服务设施免费向中小学生开放。实施“双千万”研学工程，打造“行走齐鲁”研学实践品牌。规范家长学校运行机制，提升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能力。

6.提升学生能力素养。深化育人方式改革，完善拔尖创新后备人才早期发现和培养机制。加强中小学生科学教育、科技教育，提升人工智能素养。实施中小学校园文化环境育人提升行动、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拓展文化育人空间和阵地。强化生态文明教育、海洋文化教育，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教育工程，弘扬沂蒙精神，用好“两个结合”、红色文化学习资源库，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促进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教育和数字中文建设，实施青少年学生语言文化素养提升行动。

（二）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7.强化“双一流”建设。省部联动支持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等驻鲁部属高校“双一流”建设，

深化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等部属高校在鲁设立的校区、研究机构等合作，重点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主，开展基础研究、原创性前沿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塑造国际比较优势。集中资金、集中力量推动省属高校在国家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中实现突破。

8.推进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双优”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产业教育城市协同、高校行业企业融合，着力提升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能力，重点打造一批应用能力强、产教融合深、社会贡献度高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

专栏 3　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学科专业优质特色发展促进计划

实施应用型学科筑强与成果转化提升行动，打造若干全国领先的特色应用学科和标志性科技转化成果。支持学校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一批高水平智慧课程。引领高校聚焦重点产业链，培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集群，推动学科专业深度对接产业需求，提高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适配度、服务行业产业精准度、创新成果社会认可度。到 2030 年，建设 10 所左右全国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形成特色鲜明、全国领先的发展范式。

9.深化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聚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做优中职教育、做强高职专科教育、做大职业本科教育，加快塑成山东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完善中职、高职、本科贯通培养机制，推动职业教育本科与专业学位教育融合贯通。建设一批技工教育优质专业，推动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构建与现代产业协同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

专栏 4　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计划

实施中职“双优建设计划”，建设一批优质中职学校和特色专业。实施高职“双高建设计划”，推动国家级“双高”学校领跑全国，省级“双高”学校做强特色。实施职业本科“领航建设计划”，精准培育一批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实施“产教适配计划”，绘制数字化转型场景图谱和要素清单，开展“职链齐鲁”活动。实施“区域赋能计划”，开展“职兴百县”活动，构建以区域发展贡献度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实施“内涵提升计划”，选取 20 个重点产业领域开展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打造专业人才培养标准、课程标准、实习实训标准和教师能力清单 300 项左右；深化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探索集群化、场景化、智能化培养路径，打造跨界集群、一体贯通育人范式。实施“四项技术赋能教学改革计划”，建设“人工智能＋”优质课程、未来实训中心。

10. 推进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统筹实施优势特色学科建设计划、急需学科专业布局计划、存量学科专业调整计划、学科专业内涵重塑计划，改革创新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到 2030 年，全省新增学科专业点中属于国家或区域急需的占比达到 85％以上，理工农医类学科专业点和在学规模占比达到 60％以上，学科专业与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需求适配度达到 95％以上。

专栏 5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计划

实施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机制改革试点，研究发布学科专业与产业需求适配度分析白皮书、急需学科专业清单和过剩学科专业预警清单，强化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激励保障，畅通急需学科专业布局“优先通道”、“绿色通道”、“特殊通道”。到 2030 年，分层分类建设 100 个左右重点特色及急需紧缺学科，遴选建设一批优势基础学科，聚焦传统产业和优势产业建强一批应用学科，聚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布局一批新兴交叉学科，梯队打造领军、骨干、后备、特色冷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11. 提高高校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强化高校科研基础设施和攻关平台建设，推动开展跨领域跨学科重大科研任务联合攻关，产出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构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通的科技创新体系。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落实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单列管理制度等改革措施，探索“先使用后付费”模式，打造专业化运营机构和技术经理人队伍，提升科技

成果转化效能。面向高端装备、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加强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部省共建国家大学科技园，构建环高校创新生态圈。

专栏 6　高校科技创新效能提升计划

支持高校牵头或参与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到 2030 年，国家级科研平台数达到 40 个左右。指导高校加强有组织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获批项目突破 3000 项。深入实施“百校万企万师双进”行动，建强用好全省校企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构建“中心＋节点”的大学科技园网络体系，完善“高校研发＋企业验证＋园区落地”成果转化模式。支持高水平大学联合政府、企业共建产业创新研究院。推动高校大型科研仪器、产业智库、数据库向企业开放。

12. 强化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聚焦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培养，布局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建强科教融合协同育人联合体，引领带动科研育人平台、科研教学资源和导师队伍等共建共享。充分发挥山东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示范作用，建强 10 个左右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探索由企业牵头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深化科产教协同育人，高水平建设运行高等教育共同体。深化工程硕博士培养模式改革，鼓励高校聚焦急需紧缺领域开设行业企业类“订单班”、“专项班”。健全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选拔、培养和评价机制，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提升本科教育质量，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启动齐鲁“新师范”建设计划，加强大学生实习实践。

（三）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

13. 加快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扎实推进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创建，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提高公办幼儿园学位占比。建立科学的幼小衔接机制，规范办园行为，提升保育教育质量。推动各类幼儿园依法依规配齐配足教职工。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鼓励招收 2—3 岁幼儿。

14. 深化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深入推进全国乡村教育振兴先行区建设，推动城区优质学校与乡村薄弱学校一体化办学，在乡镇驻地重点新建、改扩建一批寄宿制学校。改善城镇学校办学条件，逐步减少“大校额”学校。加快推进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鼓励设区的市探索全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路径。巩固“双减”成果，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课后服务水平，提高校外培训法治化、数字化、规范化治理能力。

15.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优质公办普通高中资源供给，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动薄弱县域普通高中托管帮扶全覆盖。严格落实属地招生、“公民同招”及优质师资区域内服务期制度，稳定县域普通高中生源和师资。做好全国科学高中建设试点，建好科技教育特色高中，推进中考招生与高中办学特色有效衔接。办好综合高中，推动职普学生互转。

16.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提高义务教育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因地制宜支持多子女家庭子女同校就读。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全面实现学前至高中阶段 15 年免费教育。加强人工智能在特殊需要学生康复和教育中的应用。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健全专门教育保障机制，推进专门教育法治化、规范化实施。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做好教育救助工作。

专栏 7　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计划

完善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保障机制，健全投入与成本分担机制。改善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强化学校标准化建设。支持优质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新建一批公办普通高中。推动所有县（市、区）至少建设一所标准化特殊教育学校，支持设区的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优化专门学校规划布局，满足具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教育矫治需求。

17.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支持体系，大力拓宽岗位渠道。完善人才培养供需适配机制，推动招生—培养—就业全链条高效联动。全面提升高校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服务能力，加强择业就业观念教育，完善课程体系，加快大学生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和生涯咨询特色工作室建设，建强指导教师队伍。

专栏 8　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计划

深入开展访企拓岗行动，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组织区域性、行业性校园招聘活动，支持创业带动就业。着力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千”计划，广泛开设“微专业”与职业能力培训课程。用好省级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加大岗位资源归集和精准推送力度，强化数智赋能就业服务。加强困难群体毕业生“一人一策”精准帮扶。

18.优化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加强学习型社会基础能力建设。深化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规范非学历教育。完善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推动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和开放大学协同联动，围绕全民终身学习需求开发资源、开展培训。加快建设山东省学分银行，建好用好山东省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建设，推动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向基层延伸，加快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

专栏 9　终身学习提质计划

支持高校面向产业工人、高素质农民、退役军人等开展学历和非学历继续教育，到 2030 年，遴选 800 门继续教育数字化共享课程。加强继续教育办学质量评估。支持高校参与社区（老年）教育，遴选 4000 个社区教育优秀课程资源，编写一批社区教育教材。一体推进“开放大学、老年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学院”办学体系建设，建成覆盖全省城乡的社区（老年）教育五级服务体系。

（四）培养造就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

19.推进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贯穿教育教学各环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

风建设，坚持师德失范“零容忍”，构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新局面。建强教师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严格教师准入管理，落实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

20.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调整优化师范教育布局结构，建设以高水平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重点参与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完善教师能力分级、梯次进阶的培训体系，强化中小学校长及义务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加强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与企业实践，推动职业学校教师与企业高技能人才按规定互聘兼职。健全高校教师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推动产业界、科技界高层次人才和博士后成为高校教师重要来源。加强顶尖人才引育、领军人才攻坚、青年人才扩容，推进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人才共引共用。

21.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加强高校职称自主评聘工作监管。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强化幼儿园及高中教师待遇保障，推进高校薪酬制度改革。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落实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政策，按规定做好荣誉表彰和先进典型选树宣传，规范做好教师荣休工作。

专栏 10　高水平教师培育计划

优化实施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工程，强化教师全员培训。深入实施齐鲁教育名家、齐鲁名师名校长名班主任建设工程，开展卓越师资培育行动。实施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集聚行动和青年科技人才建设行动。开展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提质行动，培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双师型”教师（团队）。定期举办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选树“齐鲁最美教师（团队）”。到2030 年，培训骨干教师 3 万人次，培育卓越教师 8000 名、齐鲁系列领军教师 2400 名、特聘现代产业导师 600 名。

（五）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

22.拓展高水平教育国际合作平台。面向“一带一路”沿线、

周边国家和地区，建设一批国际合作联盟和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平台。立足山东产业发展和区位优势，打造区域教育开放枢纽。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协作，支持高校加大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力度。做好高水平人才引育，集聚更多高层次海外人才。深化与港澳台教育交流合作，更好发挥鲁港澳高校院所创新联盟等平台作用。发挥高校涉外法学教育作用，支持政法领域涉外法治工作。

23.推动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实施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建设工程，引进国外高水平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鼓励省内高校与海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联合办学。支持高标准建设中国上合经贸学院。建立健全“中俄先进技术大学”合作机制，打造高水平国际化大学共同体。鼓励高水平大学参与或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国外高水平科研院所开展联合科研。

24.推进境外办学和来华留学。大力推动山东教育“走出去”，鼓励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开设海外分校；组织职业学校与大型企业协同出海，办好“班·墨学院”；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建设海外中医药教育中心；深入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稳步扩大来鲁留学规模，显著提升“留学山东”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专栏 11　山东教育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

重点推动与世界一流大学、特色优势学科开展合作，到 2030 年，新增 30 个左右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面向全球拓宽招生渠道，优化生源国别结构，建设一批来华留学外语授课品牌专业和课程，完善国际学生中国国情教育课程体系。鼓励支持海外华人华侨子女到我省学习交流。加强“小语种＋”、“＋小语种”等复合型人才培养。实施“班·墨学院提质拓能计划”，推进中国—几内亚高等工程技术学院建设。办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和中外青年学生孔子文化周等活动。

三、以规划布局为统筹，加快推进教育结构优化

（一）应对人口发展变化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建立健全与人

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扩大迎峰学段和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推进学段间集团办学和全学段资源贯通，加强中小学校、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和师资统筹配置，因地制宜推动师资流动和余缺调配。支持新建学校优先建成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或完全中学。优化乡村学校布局，重点加强乡镇驻地九年一贯制寄宿学校建设，稳妥撤并生源持续减少的乡村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办好必要的乡村学校。鼓励市级优质公办高中在薄弱县区建立分校或集团学校。支持毗邻县域联动优化乡村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布局、联合举办公办普通高中。在优化全省中小学校布局，保障好全省中小学校、公办幼儿园编制基础上，有序探索小班化教学。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加强学位供给，让更多适龄青年有学上、上好学。

专栏 12　高等教育提质扩容计划

谋划实施好“十五五”高校设置项目，新增若干所高等学校，更名升格一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基础好、特色强的普通本科学校。以优质专科层次职业学校为基础，整合资源升格一批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完善支持机制，推进康复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发展。支持高校统筹政策和资金，持续改善高校学生宿舍等基本办学条件，增强办学承载能力。到 2030 年，争取新增 15 个左右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300 个左右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有序扩大优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

（二）服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教育空间布局。聚焦优化“两圈联动、三核引领、陆海统筹、全面发力”格局，构建优势互补、支撑发展的区域教育布局，强化教育支撑能力。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层次结构，扩大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市域覆盖面，实现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设区的市全覆盖。统筹高职学校区域布局和服务面向，优化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市域布局、行业布局，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向经济人口大县下沉。推动校地深度融合发展，深化省市共建高校工作，推进省部共建高校高质量发展，支持部属高校融入省

域发展。集聚优势科教资源，服务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强化我省高校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高水平高校院所合作交流，建设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合作体。做好教育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工作。

（三）适应经济社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布局。建立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配度。围绕传统和特色优势产业高端提质、数智赋能、绿色转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建设急需紧缺和新兴交叉学科专业，构建“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加强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实体化运行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进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优化专本硕博培养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加强基础学科、交叉学科、战略急需领域专本硕博培养。建立多源数据共享的跨部门人才需求预测预警机制，构建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供给体系。

专栏 13　齐鲁“新工科”筑强行动

聚焦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领域，优化新工科布局，打造适配全产业链条的新工科学科专业群。建强山东高校新工科服务产业发展联盟，加快建设省人工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院等高水平育人平台，统筹本硕博人才培养和全省高校工科资源，推动新工科建设与产业链、技术集群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构建适配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新工科体系，提高工科类学科专业占比，打造“齐鲁新工科”品牌。

四、以综合改革为动力，加快推进教育治理创新

（一）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体制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系统性布局、整体性谋划，

强化目标、任务、政策、资源协同，增强集成效应，有效提升教育科技人才对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的支撑能力。加快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评价体系，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

（二）推进教育管理运行机制改革。深化教育事业单位改革。推进“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发展规划、资源调配、资金投入跨县域统筹。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加强教材教辅和课外读物管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健全分类发展、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分类激励机制，引导高校科学定位、贡献导向、追求卓越、办出特色。深化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赋予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依法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办民办教育。优化教育政务服务效能，深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全力办好校园餐、校车、午休、取暖、消暑、洗浴、假期托管、春秋假等民生实事。

专栏 14　民办教育提质增效计划

完善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制度体系，落实差异化扶持政策。优化实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提升民办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健全民办学校年检制度，引导民办学校优化现代法人治理体系，促进民办学校依法规范办学。建立健全民办学校资产财务管理、资金监管等制度，全面加强财务监管，防范化解财务风险。

（三）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深化教师教育创新机制改革，合理确定招生规模，逐步停止专科层次师资培养，扩大研究生层次师资培养规模。实施中小学未来优秀师资培养计划，加强优势特色师范类专业建设。实施教师渡峰、学历提升及银龄讲学计划。深化“县管校聘”改革，强化县域内教师、校长交流轮岗，优化岗位结构比例。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加大企业实践和

“产业导师”聘用力度，深化“双师型”导向考核评价改革。加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

（四）加快教育督导评价改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教育评价改革纳入各级教育督导内容，完善督政、督学、评估监测教育督导体系，健全县级以上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并独立行使职能，强化教育督导结果运用。构建基础教育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数评价体系，强化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管理。加强对高校人才自主培养质效、科研创新产出、服务贡献能力的绩效评估，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稳妥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推广划片招生、均衡派位、登记入学。高中阶段不作职普比例限制，实施同批次招生。深化高考综合改革，优化等级考试和招生录取模式。完善“职教高考”制度，拓宽中职升学通道。优化专升本考试招生模式。加强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考查，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机制和本科生多元化毕业设计考核评价机制。完善教师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推行同行专家评议机制，突出教育教学和科研实绩。统筹各类教育评价活动，减少多头、重复评价。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探索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要素、全过程评价。

（五）推动教育数智化变革。深化教育云网融合建设应用，构建覆盖学校教学、管理、生活等场景的物联网感知体系，推动教室向智慧学习空间转型。整合升级省级教育数据中心，构建教育数字基座。建立山东教育算力联盟体系，推动算力、数据、模型和工具共建共享。推广使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实施“精品数字资源筑基计划”，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校企协同”的数

字资源建设机制。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提升师生数字素养。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

专栏 15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计划

完善人工智能全学段课程，建设一批人工智能优质课程资源。到 2030 年，建设 300 所人工智能应用实验校，推动课程、教材、教学体系智能化升级。培育一批未来教师，探索建设未来课堂、未来学校、未来学习中心。实施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学改革项目工程。开展教育系统人工智能大模型示范引领行动，开发 10 个教育领域专用大模型垂直应用。整合各类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健全教育数据标准与共享机制，打造学位需求预测、教育资源布局优化等智能化应用场景。构建教育数字档案“一张网”，强化档案数据治理、标准建设和服务利用。全面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加强教育数据安全管理。强化教育 APP 监管，营造健康数字教育环境。

（六）加大教育保障机制和法治建设改革力度。健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落实教育经费“两个只增不减”要求，压实各级政府财政教育支出责任，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保持在 20%左右。适时调整优化非义务教育学校收费标准。落实各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策。强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健全并落实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机制。推进地方教育立法，构建系统完备、协调衔接的教育法规规章体系。提升教育行政执法质量，加强教育领域执法监督。加强学校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探索完善大学生法治辅导员制度，推动高校法治人才培养与中小学校依法治校双融互促。

五、组织实施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职能，强化统筹协调与督导落实。健全学校基层党组织体系，严格落实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加强民办学校党建工作，做好民办高校党委书记和党建指导员选派。纵深推

进教育领域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进清廉学校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建立健全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教育安全责任体系，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省教育厅牵头推动规划实施，各市、各有关部门协同抓好规划贯彻落实，加强规划落实情况监测评估。注重选树教育系统正面典型，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重大事项及时按程序向省委、省政府请示报告。

（来源：2026 年 11 月 4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以“双优”工程驱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

——“双优”工程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刘振天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围绕“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双优”目标，全面推进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2026 年 4 月 29 日，“双优”工程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白云校区图书馆达之讲堂隆重举行。本次研讨会汇聚了 18 位国内高等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及广东省教育厅领导，共同探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战略路径与改革实践。

本次研讨会由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主办，由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评价研究中心承办，由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广州日报数字化研究院（GDI 智库）协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教育部大学生就业研究院院长、中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瞿振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原副校长谢维和等 18 位国内高等教育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冯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兵、校长金义富、副校长许玲、副校长邓文新及学校近百名师生代表参加会议。

一、“双优”工程实施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与会领导和专家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双优”工程实施的必要性与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刻阐述。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冯伟在开幕

式的讲话中指出，教育部启动实施“双优”工程，旨在推动高校特色发展、内涵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广东作为经济大省、教育大省，“双优”工程的推进对广东来说是非常好的政策机遇；广东省教育厅将提前谋划，加强部署，持续加大对应用本科高校的支持力度，依托应用本科的现有基础抢占先机、形成优势，全面提升应用本科高校的经济社会服务能力。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兵教授在开幕式的致辞中强调，“双优”工程将为高校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更是赋能高校内涵式跃升的重要契机。学校将在省教育厅的指导下，抢抓机遇，构建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新生态，助力广东教育强省、制造强省建设。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谢维和教授指出，应用型高校在全国本科高校中占比超过 50%，这个群体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教育强国建设，关系到能否真正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他根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特别强调“生均课程门数”即课程总量与学生数量之比，是衡量办学能力优质程度的关键指标，对应用型高校适应学生多元需求、促进创新与个性化学习、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高教研究》主编王小梅研究员从宏观结构视角切入，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长期以来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夹在研究型大学和技能型高校中间，始终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境地，高等教育体系存在“中部塌陷”的问题。她认为，“双优”工程将成为破局高等教育“中部塌陷”的关键举措。据此，她进一步提出应用型本科高校改革发展的“三问”：身份之问、发展之问、生存之问，引发

了对应用型高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自身定位与核心竞争力的深度反思。

深圳大学教育学部特聘教授、长江学者讲席教授李树英则从哲学高度对“双优”工程进行了本体论追问与重构。他指出，“双优”工程并非单纯的资源配置政策，而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大学“本体性”的主动设计与哲学重构。其核心是通过知识观、关系观、时空观三重转型，使大学从学术圣殿与封闭的象牙塔，转向实践导向的学习共同体和区域开放的智慧基础设施。这一重构虽然面临传统学术评价与应用型贡献评价体系的冲突等挑战，但最终将催生兼具高水平知识创造与应用型价值实现的新型大学，成为区域发展的“神经中枢”。

二、“双优”工程的内涵与评价标准

“双优”工程作为新提出的一个政策概念，主要是指“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但其具体内涵与评价标准尚处于理论探索与实践建构阶段。

中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瞿振元教授对“双优”工程的内涵与评价标准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指出，“双优”工程涵盖优质办学和优秀服务 20 项关键指标，涉及办学方向、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科布局、科技创新、社会贡献等多个维度。这一指标体系不仅要求高校在内部治理、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到优质，更强调高校必须与区域发展深度契合，强化产教协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地方合作，最终形成以实践成果为核心的育人及评价体系。

河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刘志军教授从教育评价改革的视角，探讨了“双优”工程评价体系的构建。他指出，当前高校教育评价改革在分类体系、教师评价及

学生评价方面仍存在不足。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除了评价标准，还应包括评价目的、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运用。他特别强调，“双优”工程评价标准的研制，其功能不能止于选拔选优，更重要的是要促进应用型高校的高质量发展。他建议在构建分类评价体系时，除了制定国家标准，还应考虑制定地方标准和学校标准，评价时要突出质量、特色、贡献，避免千校一面。

教育部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孙善学教授则从人才分类与高校分类的非线性关系视角切入。他指出，当前政府和学术界倾向于认为某类高校主要培养某类人才，这是一种线性思维。但现实中，高校类型与人才类型存在显著错位：高职偏向应用型、应用型本科趋向研究型、技能型教育缺位、研究型教育过度拥挤。他据此提出，不应仅从功能角度对大学进行分类定义，而应拥抱非线性思维。他预见，应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将是现代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的必然趋势，应坚持“COE”（职业导向）教育理念，构建贯穿初级技能劳动者到应用型本科阶段的课程体系。

厦门大学重点岗位教授、教育部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刘振天则提醒，随着“双优”工程的提出，国家层面对高校改革发展划分了“双一流”“双优”“双高”三个赛道。这不仅是分类，也是标杆，更带有“标签”作用。由于位处中间的应用型高校数量多、范围广，在“双一流”尚未扩容的情况下，应用型高校应明晰办学目标和办学定位，避免因争抢“双优”标签而导致应用型高校办学趋同的问题。

三、加快推进“双优”工程建设的实践路径

围绕如何将“双优”工程从

宏观政策落实到具体行动，与会专家从组织变革、学科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国际化等多个维度提出了具体的实践路径。

在宏观战略与组织路径方面，瞿振元教授提出当前推进“双优”工程应当抓好的六个重要事项：明确办学定位、深化产教协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拓展地方（行业）合作、积极发展应用型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以及完善新型治理体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工程教育研究所所长郭卉从组织合法性视角出发，认为“双优”工程的提出为应用型高校提供了重要的“政策窗口期”。她指出，应用型高校需将“应用型”定位转化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与治理中稳定的制度安排，形成内部合法性。她建议高校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形成体现应用型的教学制度；二是完善科研制度和社会服务制度；三是优化组织机制和评价体系。

在学科专业调整优化方面，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贺祖斌教授系统分析了当前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在学科专业调整中存在的定位模糊、产教脱节、调整滞后和资源分散等困境。他提出精准定位、集群发展、产教融合、动态调整与内涵建设五大路径，并建议平衡应用型与学术性、重点建设与均衡发展等四重关系，最终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使高校成为支撑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

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方面，广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开俊教授系统分享了广州大学的实践经验。他梳理了广州大学从“虚拟班”到“拔尖创新班”的三阶段实践探索，并介绍了其确立的“双轨制”人才分类培养模式，即“拔尖创新人才”与“卓越应用人才”并重。他提出，深化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构建多部门协同的有组织培养体系、构建全链条政策闭环、探索“科-教-产-融-创”一体化培养新机制、布局建设高水平拔尖人才培养平台以及加快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学院院长蒋凯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规模全球最大，对外开放历史悠久。他认为，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关键在于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需分类推进高校发展，让应用型高校聚焦实践知识和应用研究。他提出四条国际化路径建议：“精准突破”与“体系深耕”并行不悖、“标准引领”与“在地扎根”双向赋能、“借船出海”与“造船远航”协同发力、“政—校—企—社”多主体深度协作，推动中国教育标准与资源“走出去”并本土化扎根。

四、地方师范类高校推进“双优”工程建设的思考与行动

本次研讨会特别以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为样本，深入探讨了地方师范类高校，尤其是具有职业教育背景的师范大学，如何在“双优”工程背景下实现特色化发展和内涵式跃升。

李树英教授以“深融合、特色化、生态观、慢评价”四条路径，为这类高校推进“双优”工程建设提供了哲学层面的指引。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部长王红教授同样认为，“双优”工程不仅仅是给应用型高校贴标签、争取更多资源配置，更重要的是应用型高校应通过整体性框架设计，重新思考大学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功能。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曼丽教授则从应用本科教育学科建设的视角，进行了深刻剖析。她指出，当前应用型本科教育学科因身份焦虑、使命漂移和评价错位而陷入困境。她认

为，其根本解决之道在于重新定义不可替代性——即深度嵌入并有效回应区域教育实践，构建“学术—实践—社会价值”三维评价体系。她对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提出三点具体建议：一是战略聚焦，以“职业教育师资培养”为核心特色，成为华南地区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黄埔军校”；二是机制创新，通过“校企校”协同模式，构建“产业+学术+实践”三导师制，打造“教育－产业”双向赋能的学科生态系统；三是制度保障，建立以服务能力为核心的学科评价制度。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刘铁芳教授基于古典教育研究的独特视角，为地方师范类高校的学科建设提出了四点普适性建议：一是必须走特色发展道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回应社会与教育发展需求；三是推进跨学科研究，打破学科壁垒，拓展学术视野；四是重视学科团队建设，强化有组织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一体化。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教授则从本校实践出发，介绍了职业院校教师数智化转型的路径。她提出，未来教师需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向学习的设计者，从技能的训练者转向人机协同的引导者，从课程的执行者转向能力的重构者，从个体经验型发展转向平台支撑型发展。她重点介绍了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自主研发的“师融百工”智能平台，该平台集职业院校发展决策、培训设计、专业建设优化、教师能力发展四个子平台于一体，旨在通过数据驱动，持续优化教师培养、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为“双优”工程背景下的教师能力提升提供技术与平台支撑。

五、结语

“双优”工程的提出，为占全国本科高校半壁江山的应用型

高校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对于以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地方师范类高校而言，应抓住这一政策窗口期，坚持“服务产业、引领职教”的特色定位，以教育学科建设为战略支点，依托“师融百工”等智能平台，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教师数智化转型，构建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新生态。通过将会议研讨成果转化为切实有效的政策与实践成效，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一定能破解“中部塌陷”困境，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腰部”支撑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来源：2026 年第 6 期《高教探索》）

锚定“双优”目标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副研究员 郭峰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明确提出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应用型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方阵，承载着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重任，必须在“教科人”一体发展的大格局中找准定位、担当作为。2026 年 3 月，教育部部署启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双优工程”，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核心目标。“双优工程”不仅是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标尺，更是优化办学逻辑的行动指南。“办学能力优质”是立校之本，强调核心要素的高水平供给；“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是强校之责，强调与区域产业的深度价值共创。在“双优”视阈下，应用型高校要自觉践行“教科人”一体化发展理念，从以下四个维度协同发力。锚定区域需求，重塑“优质优配”的学科专业生态。学科专业是高校的核心支柱。应用型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要坚持“地方有所需，学校有所应”的逻辑起点，实现资源优质优配。一方面，要建立与区域产业链紧密对接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 年）》，明确要建立健全学科专业优胜劣汰的常态化机制。这要求应用型高校必须主动淘汰不适应产业发展的老旧专业，增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构建“学科群—专业群—产业链”对接机制。还

要打破传统院系壁垒，围绕区域内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组建跨学科的专业集群，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契合。另一方面，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为牵引，深化专业内涵建设。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应用型高校的学科专业须嵌入这一进程，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融入传统工科、商科专业，推动专业数字化改造。

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双向赋能”的协同育人体系。产教融合是应用型高校办学的核心特征，也是实现“双优”目标的关键路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应用型高校应以此为依托，推动“四链”深度融合。其一，重构跨界协同的培养范式，打造产教融合共同体。应用型高校要跳出传统学科逻辑，联合“链主”企业共同制定培养标准，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全要素转化为课程模块与项目案例。打破封闭的课堂场域，依托企业真实生产场景推行场景化、探究式教学，推动人才培养从“知识覆盖”向“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跃升，精准匹配新质生产力对创新型应用人才的需求。其二，构筑高能级的产教融合生态，实现“科研反哺教学”。应用型高校应主导或深度参与现代产业学院、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以区域产业共性技术难题为牵引，联合“链主”企业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让师生在攻克企业真实技术痛点的过程中完成高阶项目式学习，以科技创新的真源头滋养办学能力的优质化。

锤炼跨界融合的硬核师资，锻造支撑“双优”目标的创新团队。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在“双优”视域下，应用型高校的师资素养必须从传统的“双师型”

向“创新驱动型”跃升，教师须具备跨界实践经历和打通“科研创新—技术转化—人才培养”闭环整合能力。这就要求重塑教师评价逻辑，建立以“双优”贡献度为核心的评价标尺。在评价导向上，将技术发明的“转化力”与反哺教学的“辐射力”作为核心指标，让真正解决区域产业难题、有效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师真正得到实惠。在组织形态上，打破“个体户”式的单打独斗，组建校企混编的“科教融汇创新团队”。以区域产业共性技术攻关为牵引，推动高校学术骨干与企业核心工程师双向嵌入，在“真解题、解真题”的实战中锻造师资，实现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与师资成长的同频共振，为优质办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聚力协同创新，提升“扎根大地”的社会服务能级。“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是应用型高校的终极价值体现。一方面，要开展有组织科研，破解区域产业“卡脖子”技术难题。紧密对接区域内重点产业集群，组建跨学科的科研攻关团队，将科研方向从“自发探索”转向“战略需求导向”。依托省级以上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完善技术转移转化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驱动区域发展的引擎。另一方面，建设高水平智库，赋能区域治理体系现代化。应用型高校不仅要在关键技术上提供支撑，还要在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城乡治理、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通过整合自身学科力量，围绕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报告，全方位彰显“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双

优工程”建设为应用型高校的高质量发展锚定了新坐标、提供了新引擎。应用型高校必须以“办学能力优质”夯实内涵之基，筑牢教育强国建设的坚实底座；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铸就价值之魂，厚植科技自立自强的应用根基。只有这样，应用型高校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挺起地方产业升级的硬脊梁，真正成为不可替代的硬核支撑。

（来源：2026 年 6 月 12 日《天津日报》）

“双优”建设要实现三个转变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彭湃

当前，在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三类高校分类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应用型高校的支持。

过去，将自己定位为应用型的高校在中央财政支持、学术资源、社会声誉以及人才吸引等方面完全无法和研究型大学竞争，而在企业合作资源、对产业一线的重视度，乃至学生就业率等方面一般又弱于技能型高校。“十五五”期间，“双优”建设将启动，这对一直处于“夹心层”困境的应用型高校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缺少一流应用型高校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存在短板的。因此，“双优”建设对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有重大意义。

何为“双优”？在今年 3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提出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应用型高校具有独特的基因，因此“双优”建设不能完全参照研究型大学的“双一流”建设，也不能完全模仿技能型高校的“新双高”建设，而是需要有新思路。

首先，在建设层次上要从以学校为单位向以学科专业为单位转变。以学校为主体建设单位在宏观管理上较为方便，有利于形成大学品牌效应，但容易造成资源过度向少数高校集中，忽视整体实力一般但个别学科专业领先的高校，也容易让高校形成综合化办学趋势。

绝大多数应用型高校仅有 3 个左右优势学科专业，其他的学科专业要么是从原优势学科中生发的，要么是高校合并和扩招的

产物。因此，以学科专业为建设单位最能发挥应用型高校的优势和特色。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就淡化了学校身份，强化以学科为基础和特色发展。“双优”建设可以从中获得宝贵经验。建议以行业领域的特色性、贡献的不可替代性、学生的培养规模与质量等指标开展学科专业（群）的遴选。

“双优”建设的学科专业不应以学科目录管理中的一级学科为单位，最好是以所服务的某个行业产业领域为名称来申报，以真正体现服务贡献度。同时，建议在“十五五”期间建设 500 个左右高水平应用型学科专业，以扩大建设成效，并允许一部分已经进入“双一流”建设序列高校的部分应用型学科专业申报“双优”建设。因为它们极有可能具有较强的实力，但得不到“双一流”建设经费的支持。

其次，在建设方式上要从直接给资源支持向培育资源获取能力转变。从先进国家的经验看，应用型高校一般直接面向市场办学。高水平应用型高校从行业企业及市场获得的科研和育人资源充足，能产生持续的“造血”能力，从而进入发展的良性循环。政府直接给予应用型高校资源支持，如投入资金改善硬件办学条件，尽管有必要，但不能成为主导性的建设方式。

“双优”建设应该以能力建设为重中之重，以政府投入为杠杆来撬动高校自主获取市场资源、整合产业资源，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因此，一方面建议“双优”建设重点支持校企共同体建设，以能否从企业争取配套经费作为支持条件；重点支持社会服务能力强的应用型学科专业、就业对口率高的特色学科专业、已经有较好产教融合育人平台的学科专业。

另一方面，不建议支持学术扩张，如堆砌资源申请和建设一级学科博士点、建高水平论文工程;不建议支持封闭式培养体系，如无行业企业参与的学科专业;不建议支持日常运行经费，如教师工资、行政办公经费等。

此外，“双优”建设中除了财政资金支持外，还应该通过给予各种应用型办学试点资格、支持建立各种应用型科研及育人平台，以及支持研究生专业学位点建设及招生指标等方面，形成一揽子支持计划和丰富的支持工具矩阵。这些资源虽然并非直接的资金支持，但对于促进应用型高校的内涵建设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再次，在建设评价上要从偏学术成效向偏应用成效转变。评价是“牛鼻子”，能起到重要的办学导向牵引作用。“双优”建设不能走研究型大学学术卓越的老路，而是要以应用性和服务型为导向开展评价。

在这方面，不建议以论文、基金、排名乃至专利为建设评价标准，要关注科研成果转化度、行业区域发展影响度、教师社会服务贡献度、学生发展增值度和就业适配度等应用成效指标。这样可以让那些在“双一流”建设中完全缺乏关注度的高校凸显出来。评价上的偏应用也能引导“双优”建设重心适度下沉，惠及更多的中西部高校学科专业、非省会城市高校学科专业。

最后，建议以“双优”建设为契机，改革应用型高校的治理模式。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便是应用型高校的典范。这类大学隶属各州政府，与我国应用型高校大多隶属省级政府非常类似。德国联邦政府不直接资助高校的日常运行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但可以支持各种改革项目，推动应用科学大学与区域产业集群深度融合。

我国的应用型高校大多是财政、人事和部分教育资源配置权归属省级政府的地方高校。中央政府应在建设标准设置、重点支持领域设置、应用型学科专业认证等方面战略性引导建设方向，通过配套奖励、改革试点支持、政策制度供给来实现竞争激励。

（来源:2026 年 7 月 7 日《中国科学报》）

应用型高校对接产业链与应用链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学术副校长 荀渊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王欣怡

摘　要：应用型高校对接产业链与应用链，体现了其类型定位在知识组织、专业结构、培养过程和组织机制中的具体要求。产业链呈现产业分工、关键技术环节和能力需求，为专业体系、资源配置和科研服务调整提供结构参照；应用链呈现技术、产品或服务方案落地、验证和迭代的过程，要求课程、实践和评价围绕真实问题解决过程重组，并带动教师能力和应用研究方式调整。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需要围绕产业领域调整专业体系，以真实任务贯通培养过程，优化具有产业实践经验的师资能力结构，提升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并通过实体化协同机制明确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责任分工、资源投入与评价规则。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产业链；应用链；产教融合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以后，单一办学标准难以回应不同高校的功能分工。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知识组织方式和社会服务对象上的差异逐渐显现，分类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优化学科专业和类型结构，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2015 年，《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要求，地方本科高校围绕区域和行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结构，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立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应用型高校主要承担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

才培养，并开展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方面的研究。这一定位表明，应用型高校的办学活动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向，需要面向产业发展、技术应用和区域服务来组织专业、课程、师资和科研活动。

在此基础上，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将应用型本科高校列为单独类型。2025 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2026 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提出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推进“双优”工程。从这些政策要求看，应用型高校建设已经从类型定位、转型引导，进入以办学质量和区域贡献为核心的内涵建设阶段。

在持续推进应用型高校转型的过程中，相关研究从应用型高校办学定位与转型发展、产教融合机制、学科专业建设以及“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展开了讨论，为理解应用型高校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但研究较多围绕单一环节展开，对专业调整、课程改革、师资建设、科研服务和平台治理之间的联动机制解释仍显不足。研究显示，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围绕专业调整、课程改革、校企合作和社会服务进行了探索，但在办学结构与运行方式上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矛盾；部分高校虽然确立了应用型办学定位，但专业设置、院系结构和资源配置仍主要受既有学科基础、师资条件和招生惯性的影响，对区域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岗位变化和技术迭代回应不足。

课程改革和实践教学有所推进，真实工程任务、生产流程和服务场景进入培养过程的程度仍然有限，校内课程、企业实习和毕业设计之间缺少连续的问题解决训练。师资队伍建设中，产业经历、工程经验和项目转化能力尚未充分纳入教师聘任、培养和评价体系，产业一线知识进入课堂和教材的机制还不稳定。一些高校的科研与社会服务仍主要按照传统学科项目组织研究，围绕企业技术瓶颈、行业共性问题和地方产业升级开展持续攻关的能力不足。校企合作数量增长较快，合作关系却容易停留在实习基地、横向项目和阶段性活动层面，企业深度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实践评价和平台治理的制度安排仍须完善。

为解决应用型高校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和产业发展脱节的问题，本文从产业链与应用链出发，分析应用型高校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其中，产业链主要呈现为产业分工、关键技术环节和能力上的需求，关系到应用型高校服务何种产业、配置何种资源以及建设何种专业体系；应用链则指技术、产品或服务方案在具体场景中从需求识别、方案设计、工程实现、运行验证到迭代优化的落地过程，关系到应用型高校的课程内容、实践教学、能力评价、教师发展和应用研究如何组织。

二、应用型高校对接产业链与应用链的内在逻辑

从类型定位看，应用型高校以理论知识应用为基础，面向产业升级承担技术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和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等任务。这一定位要求高校把学科知识、产业需求和应用场景联系起来，并相应调整专业体系、人才培养过程和组织运行方式。从办学活动内部看，这种对接包含四个层面：在知识层面，应用型高

校需要重新组织学科知识、工程技术、行业标准和实践经验等；在结构层面，产业链牵引专业体系和资源配置；在过程层面，应用链影响课程、实践和评价之间的关系；在组织层面，产教融合为上述调整提供持续运行的制度条件。

（一）知识逻辑：基于产业场景的知识重组与问题解决

高等教育以高深学问的传递、批判和探究为重要基础，不同类型高校则在知识保存、传播、创新、转化和应用中形成不同的活动重心。博耶对学术活动的重新界定，将大学学术扩展为发现、综合、应用和教学四种学术形态，意味着知识的综合、应用和教学同样构成大学学术工作的重要方面。知识生产模式 II 强调，知识生产可以在应用情境中展开，其问题形成、参与主体和质量判断与具体社会需求及使用情境密切相关。研究型大学更侧重高深知识探究和原创性知识生产，职业技能型院校更注重职业岗位技能的规范训练。相应地，应用型高校则以本科层次的系统知识学习为基础，面向技术应用和社会生产实践组织知识学习，既强化实践性，也保持必要的学术支撑和知识生成能力，强调知识在产业实践和社会服务中的综合使用。由此，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所依托的知识，既包括学科理论和工程技术，也应有行业标准、工艺流程和组织运行经验。在产业实践和社会服务场景中，这些知识往往与具体问题、技术流程、操作标准和解决方案交织在一起，应用型高校需要对其进行选择、组合和转化，并将其用于课程教学、实践训练和项目指导，促进学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形成。

（二）结构逻辑：以产业链牵引专业体系和资源配置

产业链为应用型高校调整专

业体系和配置办学资源提供结构参照。区域主导产业、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高校专业体系所面向的产业领域，也影响高校资源配置的重点。应用型高校办学内容、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方向具有较强多样性，其服务领域既包括制造、生产和技术开发，也包括服务、管理等应用场景。

进一步看，产业链本身是围绕特定产品或服务形成的分工协作体系，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流通服务和终端应用等环节。其内部既包括技术研发、工程化和工艺实现等科技环节，也包括成果转化、市场推广、运行维护和服务反馈等产业化环节。一个产业领域往往同时需要研发设计、制造加工、检测认证、运行维护和技术服务等多类人才，相邻环节之间存在知识和技术上的连续关系。高校围绕产业链组织专业体系，实质上是把分散在不同专业中的知识、课程、教师和平台重新联结起来，形成面向同一产业领域的专业群。由此形成的专业集群，不只是若干专业名称的并列，而应体现课程衔接、平台共用和师资协同。

同时，专业体系的变化会带动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实验室、实训基地、产业学院和科研平台如果仍随学院和单个专业分别建设，容易造成设备重复配置、企业联系分散和实践平台利用不足。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组织运行需要持续获取外部关键资源。对应用型高校来说，企业工程场景、前沿技术标准、真实产业需求和先进实训条件，都是支撑专业建设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对接产业链，有助于高校围绕重点产业领域组织资源，推动资源配置从分散投入转向集中支撑。

（三）过程逻辑：以应用链揭示应用能力的生成过程

产业链主要提供结构参照，

应用链则进一步说明应用能力如何在具体任务推进中形成。对应用型高校而言，对接应用链为培养学生应用能力提供了过程参照。现实问题解决需要经过情境理解、知识调用、方案设计、工程实施、结果检验和反馈改进，学生相应能力也需要在类似的任务推进过程中逐步形成。课程内容、实践训练和学习评价不能彼此割裂，而应围绕问题解决过程形成衔接。高校根据技术在产业现场的组合方式和运行条件，组织课程顺序、实践任务和评价依据，才能使学生在理解任务、形成方案、完成操作和检验结果的过程中实现知识运用。

应用链对教育教学过程的影响，也会延伸到教师发展和应用研究。产业应用过程中的技术规范、工艺流程和现实问题，需要经过教师的理解、筛选和转化，才能用于课程与实践教学，教师因此要具备理解产业现场、转化实践问题和组织应用性学习的能力。只有应用研究的选题来源于企业技术瓶颈、行业共性问题和地方发展需求，研究成果能够在真实的生产场景中接受运行检验，应用型高校的科学研究才能更好支撑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

（四）组织逻辑：以产教融合形成持续运行的制度安排

应用型高校对接产业链和应用链需要稳定的组织机制。专业调整、课程开发、实践教学、教师发展和应用研究，都涉及高校与企业、行业组织、地方政府之间的持续协同。过去一些校企合作主要集中在实习接收、讲座报告、横向课题等单项活动，对高校内部专业设置、课程建设、师资评价和质量保障的影响较为有限。产教融合的制度意义，在于使产业主体能够有组织地参与应用型高校办学过程，使高校能够持续吸收产业需求、技术标准和应用场景，并将其用于人才培养

和科研服务。

企业和行业组织参与应用型高校建设，需要从提供实践岗位进一步延伸到培养方案制订、课程内容开发、教材案例建设、实践项目设计、学生能力评价和平台治理等环节。现代产业学院的制度设计，正是围绕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教师发展、技术服务和组织治理等任务展开，强调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高校等多主体共建共管共享。它既整合高校内部不同院系、专业和课程资源，也连接外部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和科研机构，使产教融合从临时性合作转向较为稳定的组织运行。

三、应用型高校对接产业链与应用链的办学实践路径

产业链与应用链分别从结构和过程两个方面规定了应用型高校办学活动的调整方向，知识重组提供内在依据，产教融合提供组织条件。应用型高校对接产业链与应用链，最终需要落实到具体办学环节之中。具体而言，对接产业链与应用链首先表现为专业体系对产业分工的回应，其次表现为培养过程对应用任务的吸收，而专业与培养改革能否持续，又取决于教师是否具备产业知识转化能力、科研服务能否回应企业技术问题，以及校企协同能否形成稳定的组织安排。

本文优先选择办学定位清晰、应用型建设辨识度较高、改革举措具有代表性的高校，结合高校改革方案、政策文件、学术研究、行业报道和公开材料，提炼出专业调整、课程重组、师资流动、科研服务和平台治理等做法类型，按照“专业体系—培养过程—师资队伍—科研服务—协同机制”的顺序，由结构调整到过程重组、由主体支撑到功能拓展、再到机制保障展开应用型高校对接产业链、应用链的实践路径分析。

（一）面向产业链分工调整

专业体系

专业体系是应用型高校回应产业分工、组织培养资源的基础环节。专业调整同时受到国家战略、产业市场和知识生成三类力量的影响。国家战略为高校识别重点领域和急需方向提供基本依据，产业市场通过岗位需求、就业质量和企业技术变化传递现实压力，学科知识的发展程度则关系到新专业能否形成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和培养内容。面向产业链分工调整专业体系，需要处理好办学基础与产业变化之间的关系。高校持续把握岗位变化、技术迭代和企业用人反馈，专业增设、改造、停招和撤并才可能与产业变化保持衔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专业体系调整需要把战略方向、产业反馈和知识基础共同作为判断依据，为后续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师资建设和科研服务提供方向指引。

1.以产业领域为单元重组专业组织体系

产业链中的技术环节通常跨越多个传统学科和专业边界。单个专业可以回应某一岗位或某类能力需求，却难以独立承接一个产业领域中的研发设计、工程实现、检测认证、技术服务和市场应用等连续环节。应用型高校服务区域主导产业，需要把分散在不同院系中的专业、课程、实验室、产业学院和企业资源组织到相对明确的产业领域之下。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将原有 9 个工科学院重组为香料香精化妆品、智能技术、材料技术等五个技术学部，下设产教深度融合的产业学院和技术研究院，突出面向产业需求、深度产教融合、有组织人才培养和有组织技术创新。这种组织方式把原先分散在学院、专业和企业合作项目中的资源纳入同一产业领域，使高校在专业规划、学

部建设和实践条件配置中更直接地响应产业需求，专业体系成为高校连接产业链、组织培养资源和开展技术服务的基础结构。

2. 以多源反馈为依据完善专业动态调整

应用型高校的专业结构需要随着产业链变化持续调整。新技术、新产业带来的专业新增，以及传统专业的改造、停招和撤并，都涉及国家战略方向、区域产业需求、岗位反馈、专业长期建设和知识基础等多重因素。上海电力大学根据企业实际绘制“产业人才需求图谱”，增设储能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新型电力系统等 10 个新专业，形成覆盖电力系统源网荷储全链条的专业布局。高校应考虑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岗位变化、招生就业反馈和资源投入安排，使专业设置能够对应产业系统内部较为具体的技术分工。高校专业动态调整需要依托持续反馈机制，综合考察就业质量、行业薪资、企业招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区域产业政策等信息进行专业评估，引导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参与专业论证，从而确保专业增设、撤并和改造能够更准确地回应产业需求变化。

3. 以交叉融合为路径布局新兴产业方向

新兴产业对人才能力的要求反映到高校专业建设中，往往表现为知识体系的调整、重组和交叉融合。新技术发展可能孕育出相对独立的新专业，也可能通过改造传统专业形成新的专业方向，还可能通过不同学科交叉产生复合型专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型高校 2014—2024 年的专业调整中，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智能制造工程等新增专业较为集中，反映了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升级共同推动

专业迭代的趋势。深圳技术大学结合深圳“20+8”产业布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设置学科专业，并通过产业学院、精英班和工程项目课程等载体，引入企业实际问题，构建以项目为牵引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人才培养体系，使专业布局衔接产业技术变化。东莞理工学院与华为技术、广州中望龙腾、东莞市工业软件攻关基地共建工业软件学院，培养数学、物理、工程学与计算机科学交叉的复合型人才。两校在新兴产业方向的专业布局上都借助产业学院、特色班、微专业、联合实验室等形式来增强专业体系的开放性和适应性。

从专业建设规律看，在知识基础较为成熟的技术领域，可以设置相对稳定的新专业；对仍处于快速迭代中的产业方向，可以通过产业学院、特色班、微专业、联合实验室等形式先行探索；而传统专业的升级则需要通过“智能+”“数字+”等方式改造课程结构、实验平台和项目训练。这些灵活培养形态能够把产业链中的新技术要求和典型任务引入课程模块、实验项目和工程训练，也能借助企业平台补充高校内部难以独立建设的实践条件。

（二）基于应用链需求重构人才培养过程

对接应用链，需要把产业应用过程中的任务要求、技术规范和结果检验落实到课程、实践和评价设计之中。产业任务只有被处理为课程任务、项目训练和评价标准，校内学习、企业实践和毕业设计之间才能形成连续的问题解决训练。人才培养过程的调整，可以从课程结构、教学组织和学习评价三个环节展开。

1.以岗位能力为依据调整课程结构

应用链中的任务通常要求学生同时调动多类知识、方法和技能。能力本位教育强调以岗位需

求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计的重要依据，由高校、企业、行业等主体共同讨论岗位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再据此形成培养方案。应用型高校课程改革应将岗位能力要求前置到课程设计环节，使课程内容和课程顺序安排服务于能力形成。岗位能力要求会同时影响课程内容和课程顺序，基础知识、核心技能和专业训练之间形成衔接后，学生才能逐步转向方案设计、技术实现和应用验证等任务环节。在课程结构层面，广东工业大学设计了“1.5+2.5”的课程结构：前三学期侧重理工科通识与基础知识；第四学期开始强化嵌入式程序设计、数据库等核心技能课程；第五学期再进入专业深化学习。通过重新安排课程之间的衔接关系，前期打通数学、工程和计算机基础，中期强化软件开发和系统设计能力，后期再面向工业场景展开专业训练，学生由此能够先形成跨领域理解能力，再进入复杂应用问题的学习。在课程内容层面，兰州文理学院旅游学院将导游资格证考核要点整合进“导游知识与服务技能”等课程，社会体育学院将社会体育指导员等职业资格标准纳入课程体系。学生在课程学习阶段即可接触相关岗位所需的行业规则、职业标准和能力要求。

2.以真实任务为载体贯通学习过程

实践教学的关键在于把高校学习与产业场景相连接，真实任务用于教学需要转化为难度适宜、成果可检验的课程任务，支撑学生从模拟训练、规范操作走向较完整的问题解决过程。在双元制培养模式中，学生在高校和企业两个场所之间交替学习，高校提供文化基础课程和专业理论课程，企业提供实践岗位、实训场所和企业教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在集成电路人才培养中构建了“2.5+0.5+1”的阶段式工学交替

设计：前 2.5 年在校通过企业真实案例教学完成理论与模拟实训；中间 0.5 年整建制驻企实践，由企业工程师带教并接受产线考核；最后 1 年在企业完成顶岗研发与毕业设计。该校按产业真实的生产和研发任务周期组织教学，使校内课程、企业实践和毕业设计形成衔接，学生在模拟训练、规范操作和研发任务中逐步接近完整应用过程。项目制教学以项目为主线、以学生为中心、以实践为导向，能够通过“问题驱动—实践探究—成果产出”的完整周期促进知识迁移和能力提升。宁波工程学院机器人学院的项目制教学，围绕研发和生产瓶颈、技术前瞻领域筛选符合学生发展规律的工程问题，再依据技术可行性、教学适配性和创新挑战性将其转化为学生可以完成的课程项目。

3.以项目表现为依据改进学习评价

学习评价是人才培养过程的反馈环节。应用型高校学生评价长期存在评价标准偏泛、评价方式偏单一、行业企业参与不足等问题，易把学生能力简化为课程考试成绩等问题。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评价内容需要从知识掌握扩展到复杂问题解决、专业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等学习成果，评价方式也应增加形成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和企业参与评价。实习与项目的完成过程、操作规范性、现场测试结果和企业评价共同构成评价依据，主要致力于评价学生在真实任务中的能力表现。兰州文理学院采用了项目答辩、实操模拟、案例分析、方案设计等过程性、实践性的考核方式，要求学生在思考与协作中解决真实问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香料香精部计划推行“能力工分制”改革，将企业评价权重提升至约 40%，学生在设计与装配环节的表现需要接受企业技术

人员依据工艺规范与操作标准进行的评估。宁波工程学院机器人学院的“项目通关”评价从理论分析、实践操作、现场测试和报告答辩等方面考查学生项目完成情况，企业工程师与高校导师评价比重各占 50%。

（三）基于产业实践优化师资能力结构

基于应用链的人才培养改革，需要教师能够理解产业一线的技术标准、岗位要求和项目过程，并能据此组织课程教学、实践训练和学生指导。如果教师聘任、考核和晋升主要依据学术成果，对产业经历、项目开发、技术服务和实践课程建设考察不足，教师参与企业项目和实践教学改革便缺少持续激励。

1. 以企业导师参与补充产业知识来源

产教融合要求企业参与培养方案制订、课程建设、实践指导和学习评价。企业导师参与教学，可以为培养过程提供真实生产服务环境、一线技术经验、项目案例和岗位要求，增强课程教学和实践指导的产业关联。当然，企业导师要从临时授课者转为培养过程的共同参与者，需要明确聘任条件、授课任务、实践指导任务、评价责任和工作报酬，使其承担课程共建、项目指导和学生实践评价等具体职责。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化妆品工艺学”课程中，企业导师将生产记录、车间情境和关键工艺参数引入教学，引导学生在分析乳化温度、均质时间等工艺问题的过程中理解课程理论与实际生产之间的关系。上海电机学院机械学院学生以“准工程师”身份进入上海新松机器人、上海上飞飞机装备制造等企业，参与协作机器人应用调试、航空零部件制造等真实项目，企业导师负责核心实操技能与生产规范的传授，校内导师负责学情观察与教学过程把控。

2.以产业实践提升校内教师教学转化能力

改善师资能力结构，既需要外部产业师资参与，也依赖校内教师自身能力转型。应用型高校教师产教融合能力包括理解区域产业、技术标准和岗位需求的产业认知能力，将企业案例、技术难题处理为教学内容和实践任务的教学转化能力，以及通过技术服务、项目合作和成果转化反哺人才培养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当然，教师的企业实践要产生实际的教学改进效果，需要评价制度承认教师在企业项目中的实际贡献。高校在工作量核算、职称评审和绩效考核中考察横向课题、技术服务、成果转化、实践课程开发和企业项目教学案例，教师到企业实践才不会停留在挂职经历本身，产业经验也才能持续反映到课程建设和学生指导之中。为提升高校教师参与企业实践、项目制教学与实践课程教学工作，烟台大学的校企双聘制采取“编制在高校、科研在平台、转化在企业”的办法，确保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高效协同。

（四）基于应用问题解决牵引科研与社会服务

应用型高校的科研与社会服务，重在将已有技术或新技术用于实际问题解决。与以学科内部问题为主要取向的科研活动相比，应用型高校更需要从区域主导产业、企业技术需求和地方发展任务中提炼研究问题，并通过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人才支持和现场服务回应产业链运行中的具体需要。

1.围绕行业关键技术开展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

应用型高校依托长期积累的特色学科和行业合作基础，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中识别与自身优势相匹配的技术问题，有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科研方向，并推进有针对性的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

应用研究要服务行业关键技术，首先需要把生产瓶颈、工艺改进和产品开发需求处理为明确的科研任务，并通过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归属、收益分配和中试熟化安排，推动论文、专利转化为企业可采用的技术方案、设备产品和工艺方法。江苏科技大学与江南造船公司、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等主体合作，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的关键技术攻关提供支持。青岛科技大学围绕橡胶化工领域中的技术难题开展持续攻关，与企业合作推进化学合成橡胶湿法混炼技术、轮胎材料与工艺改进等研究，推动相关成果进入企业产品开发和生产应用过程。

2.面向区域产业需求提供人才与技术服务

区域产业发展中的企业技术改造、产品开发、县域产业升级和农业生产改进等任务需要高校提供持续的问题诊断、技术攻关和人才支持。应用型高校以行业应用项目为牵引开展社会服务，可以共同推进应用研究、人才培养和教师发展，教师、博士团队和研究生在服务企业与地方产业的过程中参与技术研发、方案改进和现场指导。高校服务区域产业和地方发展的成效评估，需要更多依据技术服务、成果转移、企业难题解决、生产效率提升、人才培养成效和地方产业贡献来判断，减少对项目数量和服务次数等量化指标的依赖。烟台大学将绿色石化、高端装备等领域的科研成果与企业技术需求对接，推动部分技术方案进入企业生产与改造环节。青岛农业大学围绕作物栽培、农机研发和基因挖掘等方向推进应用型科研，将栽培技术创新、新品种试种推广和产业服务结合起来，“福星”苹果新品种实现千万元技术转让，推动烟台苹果等产业集群发展。

（五）推进多主体参与的实

体化协同

专业调整、培养改革、师资建设和科研服务要持续推进，需要稳定的组织载体协调校企双方的资源投入和任务分工。一些平台虽然完成了机构设立和项目签约，但权责分配、成本承担、收益分享和评价规则不清，专业、教学、师资和科研之间仍难以形成持续联动。与以资源汇聚和跨主体协同为主要功能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产业联盟等平台相比，现代产业学院更直接嵌入高校办学过程，它是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企业服务、学生创业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性人才培养实体，建设任务涵盖专业、课程、教材、技术创新、实践训练和教师队伍等关键环节，使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在共同规则下参与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推动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在具体产业方向上形成衔接。

现代产业学院的实践较多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其中企业提供市场信息、生产设备、产业导师和实习岗位，高校据此开发课程、教材和实训项目，学生实践训练得到改善。对应用型高校而言，实体化平台建设需要在育人功能基础上增强应用科研和技术服务，使产业端实践知识被吸收为课程、教材和实训项目，高校应用研究成果也能用于企业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开发，进而支撑应用链中的能力训练和产业链中的技术改进。南京工程学院实施“科技创新 1111 计划”，建设康尼机电产业技术研究院、智能电网产业技术研究院等，与南瑞继保、康尼机电等企业共建研发中心，将电气工程、轨道交通装备和智能制造等领域的研究转化为校企联合研发任务。平台运行中，企业提出技术问题和应用场景，高校组织科研团队和研究生参与研发、试验和转化，学生获得真实

工程训练，企业则获得技术改进和人才支持。

当然，实体化协同机制要持续运行，需要明确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各自承担的任务、投入的资源和共享的收益。地方政府可在产业规划、财政支持和资源协调中发挥作用，行业企业提供项目、设备、工程师、技术标准和真实应用场景，高校提供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和科研团队，科研机构参与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平台运行中应明确专业共建、课程开发、教材案例建设、实践训练、企业导师参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研发和成果转化等任务，并细化知识产权归属、技术转让收益、企业导师报酬、学生实践成本和平台运行评价等规则。平台评价可重点考察课程共建质量、学生实践成效、企业技术问题解决情况、成果转化效果和地方产业贡献，减少对平台数量和签约企业数量的过分强调。

参考文献：略。

【基金项目：2025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5JZD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2026 年 6 月 20 日《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双优”工程：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导向

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宣勇

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郑莉

摘　要：地方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双优”工程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核心内涵，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价值导向与制度牵引。从“双优”工程的时代意蕴入手，深入剖析当前地方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价值取向偏差，并立足“十五五”开局与“双优”工程启动的双重历史节点，从战略校准、能力重构、评价改革、治理转型四个层面提出地方高校发展逻辑系统重构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双优”工程；地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分类改革。

2026 年 3 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宣布“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以下简称“双优”工程）。“双优”工程与“双一流”“双高”，共同构成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三双”建设，为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院校三种类型高校分别提供了“各得其所，各展其长”的三个赛道。作为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第 12 条中提出的“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的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双优”工程不仅为应用型大学提供了清晰的目标牵引与评价依据，更为占我国普通本科院校总数 95.8%的地方高校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价值导向。

长期以来，地方高等教育面临一种深层的发展困境。在“双一流”单一赛道的政策语境下，地方高校普遍对标研究型大学，以模仿与追赶为策略，形成了发展志向与区域服务使命错位、办学能力与区域贡献需求错位、评价导向与社会实际贡献错位的状况，对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实质贡献远未达到其应有的作用，其根源之一在于地方高校缺乏与自身类型相匹配的价值导向。

2026 年既是我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双优”工程的全面启动之年。两个重大政策时点的交汇为地方高等教育在新发展阶段的价值取向重构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在此背景下，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双优”工程的时代意蕴，深入剖析当前地方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偏差，系统谋划地方高校“十五五”期间的发展逻辑重构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三重视角递进展开，首先从政策建构视角阐明“双优”工程作为分类改革关键举措的战略定位，再从价值导向视角揭示当前地方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偏差及“双优”工程的纠偏意义，最后从行动变革视角提出地方高校在“十五五”期间以“双优”为坐标重塑发展逻辑的政策建议。

一、“双优”工程是“推进高校分类改革”的重要举措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优化高校布局、分类推进改革”。这一表述既是对过去十余年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的政策回应，也为“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在这一战略背景下理解“双优”工程，可以发现其并非孤立的政策安排，而是教育分类改革战略的关键落子。一方面，其承接了自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以来一以贯之的政策主线；另一方面，补齐了现行高等教育分类体系中地方高校长期缺位的制度空白，从而与“双一流”“双高”共同构成了高校分类发展的“三双”格局。

（一）分类改革是破解同质化顽疾的根本之策

中国高校的同质化是高等教育治理中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疾，也是历届党中央、国务院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早在 2010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在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意见的座谈会上就指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同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第 22 条明确提出要“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第 38 条又进一步增强要“探索适应不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与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由此成为破解同质化困境的核心政策路径。

此后十余年间，这一政策主线在国家治理的关键节点上被反复强调与深化。2024 年，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顺应人才多样化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又明确作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的部署。直至《“十五五”规划建议》将“优化高校布局、分类推进改革”写入，这一政策路径已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的方向性提法，演进为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战略。

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项被反复强调了 16 年的政策主张，至今仍未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同质

化的态势？其深层原因在于分类管理的实现不仅依赖政策文件的反复重申，更依赖配套的评价导向与资源配置机制的协同重塑。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以单一学术指标为核心，资源配置以“层级化”项目工程为牵引，导致形成了“共挤一条赛道”的制度激励。高校无论类型、区位、规模都倾向于向研究型、综合型的“主流标准”靠拢，分类管理因而难以落地生根。因此，仅以政策号召难以实现真正的分类发展，必须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各得其所、各展其长”的赛道与依据，这为“双优”工程的出场提供了内在逻辑。

（二）地方高校在“双一流”单一赛道上的定位困境

如果说分类改革是高等教育治理的总方向，那么观察当前分类体系的现实图景可以发现地方高校长期处于一种制度性的空缺地带。地方高等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版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体量地位。据统计，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普通高等学校 2919 所，其中地方高校数量占比达 95.8%，是我国高等教育最广泛的办学主体。与此同时，地方高校内部差异又极为显著，其中既有百年办学历史、学科积淀深厚的著名高校，也有超过半数为 2000 年以后教育部批准设置的普通本科院校，各校在办学历史、办学规模、办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然而，这样一个数量最广、差异最大、对区域发展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高校群体，在现行的教育分类发展政策体系中却长期面临制度真空。从政策工程层面看，“双一流”建设面向的是承担国家战略需要的研究型高校，“双高”计划面向的是高水平高职院校，二者分别在研究型和职业型两端构筑了清晰的发展赛道与评价依据。但介于其间的、以应用

型本科教育为主体的地方高校，尤其是部分有较好学科基础、较强办学能力、较深行业积淀的高水平地方大学则缺乏与自身类型相匹配的政策赛道与制度激励。

这种制度真空直接转化为地方高校在战略选择上的现实困境。定位为“研究型”从政策依据、财力支撑和办学实际看心里并不踏实，定位为“应用型”又往往心有不甘，担心被外界视为“低人一等”。在缺乏专属赛道的情况下，地方高校只能或主动或被动地涌入“双一流”的单一竞争通道，形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态势。这一态势既扭曲了地方高校的真实使命，也削弱了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整体效能。如何补齐地方高校在分类体系中的制度空缺，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推进高校分类改革无法绕开的关键命题。

（三）“双优”工程的核心内涵与价值

在上述政策语境与现实诉求的双重召唤下，“双优”工程应运而生。从政策建构上看，“双优”工程不是一项孤立的资源投入计划，而是分类改革战略中具有体系建构意义的关键举措，其内涵与价值导向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理解。

首先，“双优”工程的核心内涵具有“办学能力优质”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的双重指向。“办学能力优质”指向高校的内在功能建设，即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治理体系等方面达到与自身类型相匹配的高水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则指向高校的外在价值贡献，即立足地方、扎根区域，以高校的智力资源、技术供给和人才输出回应区域发展的现实需求。这两个维度的并列本身就传递出鲜明的价值取向，即衡量一所地方高校的“优”与“良”，不应再依据它在大学、学科排名

中的相对位置，而应依据它对所在区域是否真正起到了支撑、引领与服务作用。笔者曾借鉴“内圣外王”这一中国哲学中表达知识分子理想价值的重要范畴来形容高校内部治理与外在贡献的关系。这两个维度上是一种从“外在标签”向“内在贡献”、从“统一标尺”向“分类标尺”的根本性转换。

其次，“双优”工程在“三双”格局中具有关键意义。“双优”与已经实施的“双一流”“双高”分别面向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和高职院校三种不同类型，分别构建了以学术卓越和国家重大战略为导向的“双一流”赛道、以应用型办学和区域服务为导向的“双优”赛道以及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导向的“双高”赛道三条特色鲜明的发展赛道。三条赛道并行，意味着分类发展从“政策号召”层面真正进入“制度建构”层面，它使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政策图谱真正由“残缺”走向“完整”。

再次，“双优”工程具有鲜明的政策衔接功能和制度功能。从政策衔接看，“双优”工程是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中“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这一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为长期以来“应用型转型”这一相对抽象的政策号召提供了清晰可循的“工程”载体与制度抓手。从制度功能看，“双优”工程明确了地方高校“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的努力方向，建构起以实际贡献为核心、区别于研究型大学单一学术指标的评价框架，为后续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政策资源的差异化投入提供了制度入口。

二、破解价值取向偏差：“双优”工程的方向引领意义

“双优”工程作为“推进高校分类改革”的重要举措，承接

了 16 年来分类改革的政策主线，补齐了现行分类体系中地方高校长期缺位的制度真空，确立了与之相匹配的核心内涵与价值导向，从而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价值导向与制度牵引。理解“双优”工程的这一战略定位，正是进一步剖析当前地方高等教育发展中价值取向偏差的逻辑起点。

（一）地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

价值取向是主体基于自身价值观对客体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时所持的倾向性，是行为选择的深层依据。大学的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持续的价值选择过程。大学管理者和参与者对大学的发展目标、资源投向、评价标准、行为方式做出自觉或不自觉的价值选择，而支撑这些选择的正是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伯顿·克拉克提出的“三角协调模式”指出，政府权力、市场需求与学术权威三种力量在协调三角形内部的位置差异决定了不同国家、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取向。这一理论框架虽然提出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对分析当前我国地方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偏差仍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对于我国地方高校而言，理想的价值取向应当是政府、市场、学术三种力量的良性协调，即政府发挥分类引导和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市场提供办学方向的需求牵引，学术提供内在的能力支撑。但在现实运行中，这三种力量的协调状态出现了显著失衡。政府导向被简化为单一的“双一流”标杆牵引，市场需求被边缘化为可有可无的次要考量，学术追求则异化为论文、排名、ESI 等可量化的通用指标。在这种失衡状态下，地方高校的价值取向陷入了“内卷式”困境，目标取向、能力取向、评价取向三个层面均出现了系统性偏差，并且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共同导致地

方高校对所在区域的实际贡献远未达到其应有的水平。

（二）目标取向偏差：发展志向与区域服务使命的错位

地方高校的根本使命是服务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在“双一流”单一赛道的政策诱导下，地方高校普遍对标研究型大学，形成了发展志向与区域服务使命的深度错位。这种错位首先体现在办学定位的盲目对标上。从对全国一般本科院校学校简介或“十四五”规划中办学定位的梳理来看，全国有高达 19.36%的高校将“研究型”“一流大学”“创新型”“高水平大学”等作为办学定位。然而，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仅占全部高校的 1%左右，这是由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地方高校占我国普通本科院校总数的 95.8%，如果其中绝大多数都将“世界一流”作为现实目标，既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也背离了分类发展的政策逻辑。除此之外，错位还进一步体现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上。有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将“双一流”建设成效与“高等教育 GDP”进行连接，部分省份已经明确提出把“双一流”建设绩效纳入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内。这种政策传导机制使得“双一流”标杆从中央层面的国家战略，被层层放大为省域层面的普遍追求，地方高校的差异化定位空间被极大压缩。

值得指出的是，“志大”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志向太大”，而在于“取错了标杆”。地方高校并非不应有远大志向。一所地方高校立志成为应用型办学的标杆、立志成为服务区域发展的典范、立志成为某一行业领域的领跑者，同样是宏大而值得追求的志向。问题在于，当前地方高校把研究型大学当成了唯一的成功模板，把“双一流”当成了唯一

的卓越标准，从而在客观上放弃了在应用型办学这一更适合自身的赛道上确立卓越地位的可能。这种目标错位的直接后果是地方高校将有限的资源、师资、精力投向了与区域需求关联度不高的通用学术指标竞争，而对所在区域的实际贡献则因此被边缘化。

（三）能力取向偏差：科技创新供给与区域贡献需求的错位

如果说目标取向偏差体现在发展志向层面，那么能力取向偏差则体现在更具体的办学能力建设维度。地方高校在科技创新指标上不断进步，但这种创新供给并未有效转化为对区域发展的实际贡献，形成了“指标繁荣”与“贡献不彰”之间的显著反差。从总量指标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表现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我国的研发投入、人力资源储备、论文产出、专利产出都位居世界前列，许多指标已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第二方阵，与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高等教育体系并驾齐驱。《2025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热点论文数量世界占比已经达到 53.2%，居世界排名第一位，高被引论文数量为世界第二位，与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根据《2025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的创新指数排名已经位列第 10 位。其中地方高校在各类世界知名排行榜上也持续进步，多所地方高校进入主流大学排行榜前列。

然而，与这种亮眼的指标表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率不够突出。有研究指出，2003—2023 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对全国 GDP 年均增长率的贡献率约为 4.08%。相比之下，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已经分别达到 14.61%、8.64%、10.52%和 4.2%的水平。换言之，我国高等

教育的经济贡献率水平甚至低于半个世纪前西方主要国家的水平。具体到地方高等教育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已有研究也指出，“当前许多地方高校存在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需求脱节，校地合作机制不健全和社会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不足”。这种“指标进步而贡献不彰”的反差揭示出地方高校将办学能力的建设方向锁定在了通用学术指标体系上，而非区域需求导向的应用能力建设上。地方高校的科研产出大量集中于追求发表数量和影响因子的论文写作，而对区域产业升级所需的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攻关、应用场景验证等方面的投入相对不足；人才培养按照通用学科逻辑设置专业，而对区域产业链所需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针对性培养仍显薄弱。这种能力建设方向的偏差使得地方高校虽然在通用指标上不断进步，但对区域发展的实际支撑作用却难以有效提升。“双优”工程提出的“办学能力优质”强调与服务区域使命相匹配的、应用导向的“优质”，是对当前地方高校能力取向偏差最直接的回应。

（四）评价取向偏差：自我标签化与社会实质贡献的错位

价值取向偏差深层的制度性根源在于评价取向的异化。许多地方高校在发展路径上热衷于通过“211”“985”“双一流”等国家建设工程标签来界定自身水平与身份，而非基于实际的社会贡献与能力提升来确立自身价值，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标签化”倾向。这种自我标签化的逻辑从制度激励层面强化了前述目标偏差与能力偏差，带来了多重后果。首先是办学行为的同质化。当地方高校将能否进入某一国家建设工程的名单视为衡量自身水平的核心标准时，其办学行为必然会

向标签所规定的指标体系趋同，从而忽视各自区域发展与行业服务的差异化使命。无论身处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无论是工科见长还是文理见长，地方高校都倾向于按照同一套通用标准开展办学行为，导致“千校一面”的痼疾在新的政策语境下不断再生产。其次是评价导向的异化。对此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就是“工科理科化”。为迎合以论文为核心的评价考核体系，原本以工程实践为根基的工科院校转向了以理论写作为主的研究路径，研究生缺乏基本的工程实践能力，难以进入企业真正承担工程任务。这种异化的本质，是评价指标的工具理性僭越了人才培养的价值理性。类似的异化在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师资评聘、研究生培养等多个环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自我标签化的第三重后果是校地关系的疏离。当地方高校的注意力被标签竞争所吸引，其与所在地方政府、区域企业之间本应紧密的互动关系就被弱化。政府、企业、大学之间未能形成良性互动的“三螺旋”关系，地方高校陷入了以自我标签为中心的“内循环”，对区域经济建设的实质性支撑作用因此受限，进而使地方高校在身份焦虑中错失了在自身赛道上确立价值的机会。

（五）“双优”工程的方向引领意义

目标取向偏差、能力取向偏差与评价取向偏差并非孤立的问题，而是共同指向一个深层根源。地方高校缺乏与自身类型相匹配的价值取向，而“双优”工程的方向引领意义正在于此。它不是又一个增加资源投入的政策工程，而是从价值取向层面对地方高等教育发展逻辑的系统性重塑。通过明确地方高校的发展志向应当锚定在区域服务使命之上而非追逐研究型大学的标杆，为地方高校在应用型办学赛道上的卓越追

求提供合法性确认；通过将办学能力的建设方向从通用学术指标转向与服务区域使命相匹配的应用能力，使地方高校的能力建设真正服务于区域发展的实际需求；通过强调服务区域的实际贡献而非将通用学术标签作为衡量地方高校水平的核心标准，从而从制度激励层面破除自我标签化的恶性循环。“双优”工程为地方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重构提供了清晰的制度牵引和方向引领，通过目标取向、能力取向、评价取向上的同步纠偏可以使地方高校得以真正告别“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在与自身类型相匹配的价值坐标上重新确立发展方向。当前，“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与“双优”工程的全面启动恰逢其时，这为地方高校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三、以“双优”工程为坐标重构地方高校“十五五”发展逻辑

目前，绝大多数地方高校的“十五五”规划文本是在“双优”工程出台之前编制的，其战略坐标、目标体系、资源配置仍然停留在“双一流”单一赛道的政策语境之中。如何把握重大机遇，完成规划文本与“双优”工程导向的对接调整，以“双优”为坐标实现地方高校发展逻辑的系统重构，已经成为地方高校无法回避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曾告诫：“各地区要根据自身条件和可能，既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又抓住短板弱项来重点推进，不能脱离实际硬干，更不要为了出政绩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最后什么也干不成。”这一论述对当前地方高校的战略选择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一）以“双优”工程为标杆校准地方高校“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坐标

地方高校“十五五”规划编制的核心要务是战略坐标的重新

校准。战略坐标的校准首先需要地方高校综合考量自身的办学历史、学科结构、师资构成、生源基础作出类型选择，明确学校在“研究型—应用型—职业型”分类格局中的实际位置，不能在类型定位上模糊不清、左右摇摆。尤其是部分高水平地方大学可能面临“双一流”与“双优”两条赛道之间的关键抉择。这类高校既有冲击“双一流”的潜在基础，也有立足“双优”的现实优势。但是倘若在两条赛道之间犹豫不决、试图“脚踏两只船”，从策略表面上看是机会主义的稳妥，实质上是战略上的最大冒险，容易导致既无法在“双一流”赛道上获得足够的资源累积，也错失了在“双优”赛道上确立先发优势的窗口期。在所属类型明确后需要进一步判断学校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是处于行业领跑位置、跟随发展位置还是基础建设位置，由此决定地方高校“十五五”期间的战略重点。最后是区位判断，要清晰所在区域的产业结构、发展阶段、人才需求对高校提出了何种具体要求，这是地方高校战略定位最重要的外部坐标。以上重要选择判断构成地方高校战略选择的现实基础。基于此，进一步完成“双优”工程导向校准工作，使战略目标的表述与“双优”工程的核心内涵相对接，发展指标体系增加“服务区域贡献”维度的实质性指标，并且将资源配置方向向应用导向的能力建设倾斜。这种校准不是规划文本的小幅修订，而是发展逻辑的系统重构。

（二）以应用导向重构地方高校的核心办学能力

“办学能力优质”是“双优”工程的核心要件之一，要实现与服务区域使命相匹配的、应用导向的“优质”要求，地方高校在“十五五”期间需重构核心办学能力。包括重构学科专业的区域

适配能力，系统开展高校学科专业与区域发展需求匹配度评估，在深入研判所在省域、市域的产业结构现状与“十五五”产业规划方向的基础上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适度收缩与区域产业需求关联度低的传统学科，加大对关联度高的应用型学科的投入，从而使学科专业结构具备对区域产业变化的快速响应能力。要重构科研力量的应用研发能力。地方高校的科研力量需要从“论文导向”转向“问题导向”，通过构建配套的科研立项机制、科研评价机制以及科研组织模式，使科研力量重点围绕区域产业升级中的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应用场景验证、技术成果转化等开展应用研究。尽管“工科去理科化”是一项需要数年才能见效的系统工程，但“十五五”期间的机制建设将决定这一转向能否真正落地。另外还需要重构人才培养的产教融合能力。产教融合不是新提法，但过去落地不充分的关键原因在于校企之间缺乏深度协同的制度安排，“十五五”期间要进一步破解这一困境，建立企业实质参与培养方案制定的常态化机制，建设具有真正产业属性的产业学院，构建校企双导师制度，推进实习实践环节的产业化升级。

（三）以贡献本位重构地方高校的评价与激励机制

评价机制是价值取向的制度保障，地方高校的“自我标签化”问题根源就在于现有评价机制未能形成对地方高校服务区域贡献的有效激励。“双优”工程的方向引领要真正落地，必须有与之匹配的评价机制改革，要围绕“双优”工程“办学能力优质”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的双重内涵建立“能力”与“贡献”双维度的评价框架。其中“能力”维度评价地方高校的内在功能建设质量，“贡献”维度则主要评

价地方高校对区域发展的实际支撑作用，包括人才培养贡献、技术成果转化贡献、智库服务贡献以及文化传承创新贡献等，后者应当占据评价权重的较大份额，与“双一流”评价体系形成实质性区别。这一双维度框架的建立，需要中央层面在“双优”工程的具体评价标准设计上给予明确指引。在此基础上，评价不能止步于评价本身，必须建立与资源配置连接的传导机制。“双优”工程的政策效力发挥关键在于评价结果能否实质性地影响中央和地方两级的资源投入、政策支持、建设项目布局。这一传导机制的建立是“双优”工程区别于一般性政策号召的根本所在。而地方高校内部的资源配置也应当以“双优”评价框架为依据进行重构，将外部评价导向有效传导至学校内部的院系、学科、教师层面，形成自上而下贯通的激励链条。

（四）以分类引导重构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治理逻辑

地方高校的价值取向重构离不开地方政府治理逻辑的同步转变。地方政府作为地方高校的投资和管理主体，其政策导向直接塑造地方高校的发展取向。地方政府需要充分认识到，本省地方高校群体内部本身就具有显著的类型差异，既存在有可能冲击“双一流”的少数高水平地方大学，也有数量众多的应用型本科高校，还有承担特定行业服务功能的特色高校。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应当尊重这种内在差异，为不同类型的地方高校提供差异化的政策支持。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实施的《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为此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国际经验。通过规划的形式确定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边界，使各类高校在各自的赛道上获得稳定的发展预期。地方政府可以借鉴这一思路，

结合本省高等教育实际，制定具有分类引导功能的省域高等教育规划。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财政投入这一塑造地方高校行为的核心制度工具。通过建立与“双优”工程相匹配的分类财政投入机制，一方面对承担“双优”工程建设任务的地方高校给予与其类型定位相适配的专项支持；另一方面对服务区域产业关键需求的应用研究、产教融合项目、产业学院建设等建立稳定的财政保障机制，使不同类型的高校都能在自身赛道上获得与其使命相匹配的资源支持。

“双优”工程的提出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地方高校第一次拥有了与自身类型相匹配的国家级建设工程作为方向引领，获得了在应用型办学赛道上确立卓越追求的制度合法性。地方高校能否抓住“十五五”开局之年与“双优”工程启动之年的双重历史机遇，在战略、能力、评价、治理四个层面完成系统重构，将直接决定我国地方高等教育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格局。我们期待并相信，在“双优”工程的方向引领下，地方高等教育将告别同质化竞争的旧逻辑，开启分类发展、特色立校、服务区域的新篇章，这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分类改革战略最有力的实践回应，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切实的高等教育贡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 2024 年度教育学重点项目（A1A240013）】

（来源：2026 年 7 月 10 日《中部高教研究》）

“双优”评价模式构建的逻辑机理与实践方略

浙江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杰出教授 王洪才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 王惠

摘　要：“双优”工程是我国针对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采取的引导性政策，政策一旦落地将对半数以上的高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政策的创新性、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可行性五维都至关重要。从创新性看，“双优”评价必须与“双一流”“双高”有明确区别；从科学性看，“双优”评价指标构建必须基于应用型高校自身特质，即必须以社会服务为导向，从应用型人才培养根本目标出发；就合理性论，“双优”建设必须从应用型科研方面进行突破，其核心是抓好教学创新型师资建设；从有效性看，促进产教融合是“双优”评价目的所在，达成机制协同是有效基础；在可行性上，“双优”评价需要从总结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成功经验出发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只有五维有机协同，才能使“双优”建设稳妥落地。

关键词：“双优”评价；应用型人才；应用型科研；教学创新型师资；创新创业教育

一、“双优”建设：价值·特点

1.“双优”建设使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趋于完善。当“双优”建设提出后，其实践价值迅速得到认可：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政策正趋于完善。“双优”建设提出了判断应用型高校办学水平的内外双重标准：一是办学能力优质，二是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优秀。二者将极大地促进应用型高校内涵建设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应用型高校办学能力的强弱最终应体现在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上。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力量集中于地方高校，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拨款，而且入学人口也主要来自当地，当高校办学能力达到优质水平时，其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大的助力，从而更容易获得当地群众的支持，对于地方政府治理而言也极为有利。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优秀意

味着高校能够主动解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服务地方发展，从而助力形成校地良性互动的社会生态。

2.“双优”评价标准应具有反思性、建构性特点。找到不同类型高校办学真正的区别点非常不易，正是这个根本难点的存在，使得“双优”评价“千呼万唤始出来”。因为高等教育学界短期内还无法呈现一个确切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指标来遴选适合应用型高校发展的标准并发挥引导性作用，大众也只能根据高校最终的发展结果进行评价，这样的效力自然就大打折扣。很多教育改革的效果是多重原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绝非某个指标或要素独立作用的结果，这就使得评价指标的构建异常困难。“双一流”建设的各种指标也是事后总结或经验反思的结果，并非一种超前的理性设计，基本是根据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一般经验进行设计，并非完全科学、合理，也不一定符合研究型大学的个性发展规律。由此，“双优”评价标准必须具备反思性、建构性特点，才能使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有的放矢。

二、“双优”建设的逻辑机理：起点·中介·终点

1.“双优”建设的逻辑起点：确立社会服务理念。自从美国大学模式兴起之后，社会服务理念就已经深入人心，社会服务精神也是美国大学发展的动力，社会服务功能对于所有美国高校都是适用的，因为这是美国高校适应市场机制的关键所在。当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为评价应用型高校办学水平的核心指标时，可谓抓住了关键。但“办学能力优质”与“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优秀”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内与外、体与用，抑或是因与果的关系，我们可以把高校办学能力理解为

内在、本体、原因，社会服务能力是外在、应用、结果，甚至理解前者是皮，后者是毛，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内与外的关系非常明显，因为离开了办学能力本身，就谈不上社会服务。一般而言，如果一个高校在内外两方面都达到优秀水平，其整体水平就是优秀的。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双优”的逻辑基础是什么？“双优”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系？

从逻辑上讲，办学能力优质并不一定代表社会服务优秀，社会服务优秀也不一定代表办学能力优质。事实上，两者不可能是一一对应关系，而且两者往往采用不同的评价尺度，遵循不同的逻辑，从而两者在表现上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办学能力评价维度比较全面，更侧重办学过程的评价，遵循育人为本逻辑，特别强调政治思想性。比如是否符合国家政策要求，是否达到教学计划目标要求，是否满足学生发展要求，以及学生是否会顺利地走向社会。就目前而言，每所高校都在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方针办事，这是其合法性的基础。而在达到教学计划目标要求方面就比较难以判断，因为这需要看教学目标是否符合实际需求，能否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其中的关键在于教学目标的要求并非固定不变，经常需要根据时代进步和实际要求做出调整。事实证明，目前不少问题都反映出高校教学内容、手段、方法已然落后，换言之，传统的教学目标要求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所以不能完全按照既定的目标来衡量。在是否满足学生发展要求方面也充满异议，现在课堂抬头率、满意度低是一个客观现实问题，不容回避。此外，当前劳动力市场面临结构性压力，高校毕业生在进入职业场域时所展现的胜任力水平，与产业端的实际用人需求之间尚存明

显的适配性缺口，这也是国家特别强调要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根本原因。综合来看，高校在办学能力方面达到优质水平还需克服重重困难。

与之相比，高校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遇到的质疑更加突出。社会服务遵循市场竞争逻辑，强调效益如何。大学生就业状况本身就是衡量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但能否解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则是一个更关键的指标。如果高校具有社会服务精神，主动研究市场变化需要，积极帮助企业解决技术升级难题，那么校企关系、校地关系将得到极大改善。这种关系改善也将重塑大学教师的精神面貌，成为他们改革教学的动力源泉，如此也会带动教学质量的提高，进而引领办学能力的提升。显然，目前，高校在这方面表现欠佳，因为高校没有得到地方产业和企业的大力欢迎，常常出现“高校热企业冷”的情况。这也说明，办好应用型高校，做好社会服务是关键，具备社会服务精神是根本。

2.“双优”建设的逻辑中介：必须搞好应用型科研。应用型高校如何才能做好社会服务？从逻辑上讲，搞好应用型科研是根本出路。所谓应用型科研就是以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为导向，不以论文发表为导向。换言之，科研能否取得实效是对科研能力评价的根本标准，而非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或引用率作为评价指标。这要求高校在科研立项过程中严格把关，审查问题来源，评价是否具有应用价值。为了保障科研的有效性，应用型高校开展科研必须要与企业进行合作，因为封闭式科研很难找到真问题，研究成果很难具有应用价值和市场前景。目前高校的科研管理机制普遍采用模仿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模式，倾向于论文发表的科研，

对应用型科研缺乏实质性激励机制，从而开展应用型科研的力量还没有真正组织起来，这也抑制了高校服务地方发展和企业科技攻关的能力。

3.“双优”建设的逻辑终点：培养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应用型高校必然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根本追求，这是办学定位所决定的。对于应用型人才是什么，学术界还缺乏严格的定义。已有的一些提法很难令人满意，如应用仅仅分为知识应用和技术应用，模糊了应用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的区别。为此，需要对应用型人才做出操作性界定。应用型人才是指善于将专业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表现出对问题的敏感性，对专业知识的娴熟性，特别是具有勇于实践的品质。显然，应用型人才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与理论型人才、研究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相对的，后者都是针对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而言的，但似乎并不适合本科教育层次。

对于本科教育而言，学术型人才具有浓厚的学术兴趣，不以直接就业作为目标，对知识本身具有兴趣，有志于从事学术职业，求知若渴，喜欢探究问题，把进一步深造作为自己的价值选择。与之相对，应用型人才首先是以就业创业为目标，对实用技术技能非常感兴趣；其次是比较喜欢社会交往，热衷于回应现实问题，认为解决这些问题更能凸显个人价值；再次是对于物质奖励比较敏感，对市场变化反应非常敏捷，很容易从中获得成就感；最后是对于社会荣誉比较热衷，渴望获得社会认可，把追求事业成功作为人生目标。所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当善于识别这些品质，并有意识地激发这些品质，使这些品质成为学生自觉成才的动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当具备明确的质性规定与量化标尺，切

忌沦为缺乏界定的空洞概念。

4.“双优”建设的底层逻辑：重在做好创新创业教育。应用型高校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其能够把应用型科研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有机统一。如何才能将两者有机统一呢？根本出路就在于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对于教师而言，要把课程教好，就必须了解学生实际需要，懂得市场需求，善于运用实践案例教学，而且能够把专业知识有机地嵌入课程。显然，如果教师没有具体的实践经历就无法理解市场需求，也无法真正走近学生。但课程教学又不能游离于教师科研工作之外，要将两者统筹起来就只有从事应用型科研。

应用型科研的典型特征是：研究问题是真实可感的，是亟待解决的，从而能够激发人强烈的探索欲望。如果能够把这种真实的问题情境带入课堂，使学生成为科研项目的参与者，引导他们在尝试解决问题过程中逐渐改变学习习惯，把接受式学习变为探究式学习，从而调动自己的知识内存，主动寻求资源求解问题，通过沟通合作获得启发，这样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得到了提升，创业能力也得到了开发。因为创新创业能力从本质上讲就是对问题进行确定、对问题进行分解、对各种可能性答案进行验证，最终找到解决方案，然后验证效果如何。这个“发现—分析—解答”的过程，既是一个创新过程，又是一个创业过程，因为创新与创业本身就是一个连续统，如果没有创新作为前奏，就没有创业的效果。反之亦然，如果没有创业目标牵引，就难以产生创新活力。

教师的科研和教学过程也同样遵循“发现—分析—解答”问题的逻辑，这意味着，教学活动绝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要教会学生会学习、会探索、敢于尝试，这就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实

质，这个过程应该通过教师身体力行来实践。如果把握了这个根本特点，就找到了“双优”评价模式构建的科学根据。

三、“双优”建设的实践依据：师资·平台·机制

1.培养创新创业人才需要大批教学创新型师资。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时代对高等教育提出的基本要求。所谓创新创业人才，简言之就是“敢闯会创”人才，这四个字道明了创新创业能力的真谛。其中“敢”是第一位的，即“敢为天下先”，敢字当头，说明了冒险精神对成为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性，不然创新潜能就难以激发；其次是“会”，说明必须具备综合素质，不然就难以融会贯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仅仅具有专业知识远远不够，还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特别是要有敢闯无人区的勇气，并且善于分析问题，善于多角度思考，善于把理论知识与现实情境有机结合起来，不然就难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会创”的真切体现。“敢闯”“会创”相结合就是创新创业能力的基本表现。

同时，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知识和能力不足时，必须善于利用各种资源去学习和充实自己，这既是自我发展能力的表现，也是终身学习时代每个人必须具备的终身学习能力，同样也是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表现。在创新驱动发展时代，许多问题都没有固定答案，需要用敢于尝试的精神去寻求合适的答案，这种不满足于现成答案的精神就是创新精神的体现。因为任何答案都不是唯一的，都必须以适宜环境和最大功效作为衡量依据，这种对效益的追求过程就是创业能力的体现。所以，在创新驱动发展时代，高校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这是使其成为创新创业人才的基本素质要求。显然，要

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教师自身首先必须具备创新创业品质，必须敢于进行教学改革探索。

2.教学创新必须具备联系企业的能力。要做好创新型教学，教师就不能完全拘泥于书本知识，必须广泛地吸收社会实践知识，能够把现实中的真问题引入课堂，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增强教学活力。现在学生普遍厌倦了照本宣科型的教师，开始广泛地通过网络资源吸收知识，从而使纯粹书本知识教学的局限性逐渐放大。如何让课堂教学充满新鲜感，是每个教师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深入实践一线。如果教师不深入实践一线，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课堂就难免缺乏趣味。这也呼唤课堂教学必须改革，首先要控制课堂规模，方便开展教学互动；其次要改变课程设计，引入实践内容，让学生真实体验到现实需要；再次是改变教学形式，增加现场体验，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最后要改变考核方式，让实践成果成为学生成长的证明，不然就无法为教学注入生机。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教师具备联系企业的能力，这样才能深入下去，获得真实的体验，如此才能带领学生深入生产现场，获得真切体验。这对于目前的教师能力素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3.联系企业需要高校搭建通向产业的平台。高校有责任创造条件来改善教师的能力素质结构。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高校要建立稳固的联系企业的渠道。无论从声望上还是从可信度上，由学校出面与企业进行合作建立实践平台要比教师个人与企业联系要容易得多。无疑，这就需要大学组织创新，设立专门负责与企业联系的部门。同时需要进行大学制度创新，建立与企业有机联系的制度。这就要求改变大学与企业的关系，建立更多的横向联合关

系。为此，要在制度设计中鼓励引入更多的企业资源为课程改革、教学改革服务。比如可以组建专业课程改革委员会，吸收企业中的优秀成员参与课程教学，使课程内容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感，使课程设计与学生的未来发展建立密切的联系。目前，很多高校都聘请了企业高管作为学校发展顾问，这确实有助于加强高校与企业的联系。但许多合作往往停留在协议上，并未发挥实质性作用。要让合作真正发挥作用，应该是双方合作开展专业建设以及科研攻关，这样才能把双方的利益关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4.建设合作平台需要建立融通高校与企业的机制。目前产教融合的难点在于难以融通校企两种不同的运行机制。这涉及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文化。高校是事业型组织，讲求社会效益，追求公益性；企业是营利性组织，讲求经济效益，追求利润率，否则就难以持久下去。开展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就必须正视两种不同组织的文化区别，必须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能够融合两种不同文化特质。换言之，建立高校与企业合作平台就需要打通两种不同性质的运行机制之间的隔阂。进而言之，企业运转遵循的是市场主导的运行逻辑，讲求利益分享，讲求成本效益。高校运行仍然是以计划体制为主导，行政化色彩较浓，对利益关系敏感度偏低，对企业的运行规则认知不足，效率意识也较为薄弱，从而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分歧。为此，高校必须主动接纳企业的运行逻辑，尊重市场机制，这样才容易开展有效合作。故而，融通两种不同性质的运行机制，是高校开展现代产业学院实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衡量“双优”评价模式有效性的参照系。

四、“双优”建设的前期实验：基础·难关·突破点

1.现代产业学院是大学组织变革的重要实验。为了克服产教分离状态，使高校更好地为产业发展服务，培养出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开始进行现代产业学院改革试点。此举直指高校人才培养软肋，也戳到了企业发展的痛处，故而引起了企业的极大兴趣，也激发了高校改革积极性。然而，改革实验毕竟是两个性质非常不同的组织进行合作，需要各自打破自身惯性，设计一种新的融合性运行机制，这对双方都是极大的挑战。尤其对高校的挑战更大，因为高校的运行机制相对封闭，基本与市场运行脱轨，要转向市场运行轨道非常困难。对于企业而言挑战也不小，因为企业很难忍受高校运行不计成本的经营逻辑，所以要让合作经营成本明晰化和权责合理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双方合作成功，就可以为高校转向市场经济运行轨道提供一个有效范本，如果不成功，就会使人才培养效果大打折扣。

2.高校与产业双向努力是成功基础。面对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如何正确面对是一个基本问题。这需要校企双方在不断接触和交流过程中达成合作方案。没有人能够预先把一切可能的问题都考虑到并精准地设计好推进路线，而是必须不断地协商探讨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这需要双方都有信心和耐心，坚信一定有解决问题之策，一定有达到双方满意的路径，都不能急于求成。一般而言，企业讲求效益，追求工作效率，倾向于快速制定详细具体的规定，然后就可以照章办事。学校讲求育人价值，讲求无形效益，在面对不确定情境时不希望草率地作出决定，避免陷入不遵守协议规定的被动状态中。可见，双方磨合是必须的，需要双方都具有信心和谈判技巧，既要追求效率又不能过于草率，

这样的平衡过程非常考验合作双方的智慧。

3.用对人、规划好、机制新形成三道关口。无论高校还是企业，合作创建产业学院最关键的就是选对人和用好人，即由谁出任院长尤为关键。现代产业学院对院长的素质要求非常高，要求其必须具有非常强的经营管理能力，换言之，仅具有学术工作的经历是无法胜任的。具体而言，首先，院长必须具有战略眼光，明晰学院目标、学校利益、企业核心诉求等，这些都是学校用人考察的前提条件。其次，院长必须具有成功的管理经验，这是一个必备条件，不然在管理上就很难具有威信。再次，院长必须具有与企业合作的成功经验，无论是从事科研项目还是进行人才培养，这些经历都让他了解企业的运行规律，从而可以做到知己知彼。最后，院长必须具有谈判技巧，必须知道何时必须坚持，何时应该妥协。

如果院长人选得当，就可以把学院的建设规划做好，这些工作蕴含了高度的创造性。显然，规划设计需要详略得当，既不能过于粗疏，不然会造成无章可循，也不能太过细碎，不然就难以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学院运行机制设计需要遵循一种复合逻辑，既要尊重教育规律，又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并且通过遵循市场规律实现对教育规律的尊重。由此可见，选对人用好人、做好规划设计、确定运行机制是三级紧密联系的链条，最终要落实到运行机制维护上，运行机制维护非常考验设计者的创造性和平衡智慧。

4.项目式教学、科研带动教学是“双优”建设的突破点。现代产业学院运行过程中的鲜明特点在于采用了与传统学院不同的教学组织方式。传统二级学院在教学过程中仍然盛行知识体系传授方式，即将教学方案设计为一

门门课程，每门课程都自成体系，课程一般都围绕基本概念、核心概念和具体概念进行演绎，然后辅助一些实践案例来讲解概念形成与演变过程，重点在于让学生掌握知识的体系框架，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最终形成一种稳固的认知模式，至于知识如何应用到现实场景中则很少涉及。而这种设计很难让学生将理论知识灵活运用在具体实践中。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就是要打破这种教学模式，要培养学生即学即用的能力，如此就需要采用做中学的教学模式，项目式教学是实践这种教学模式的最好载体。但教师要想驾驭好这种教学模式，就需要从事应用型科研，熟悉现实问题场景，并且解决过企业面对的核心问题，从而可以将亲身经验传授给学生。这种无形知识对辅导学生开展项目式学习非常具有价值。这是一种以科研带动教学的模式，也是应用型高校追求“双优”的突破点。因为唯有教师做好应用型科研才能做好社会服务工作，而高校唯有社会服务做得好才能培养好应用型人才，才能提升办学水平，进而使办学能力达到优质水平。故而，有效总结和汲取现代产业学院的成功经验是衡量“双优”评价模式的可行性基础。

五、“双优”建设的突破路径：核心·导向·服务

1.应用型科研质量是影响“双优”建设的核心变量。应用型科研质量是决定“双优”建设成败的关键变量乃至核心变量。一言以蔽之，如果高校的应用型科研做不好，就难以在社会服务上做出突出成绩，更无法培养出大批优质的应用型人才。而教师的科研素质又是其中的关键，因为教师的科研能力素质并不是体现在书本上或口才上，而是体现在示范即行动上，这个行动就表现为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

技术问题。换言之，教师能力水平不体现在学历证书层级上，而是体现在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上，这是一种综合能力，非理论思辨能力所能涵盖。其中涉及与企业管理层的沟通交流能力，与企业技术骨干的科研协作能力，与一线技术工人的深入交流能力，还包括广泛吸收前沿科技信息和综合运用已有知识的能力。如果没有敢于面对错误的勇气，始终保持学者的矜持姿态，很多实际问题就接触不到，一些实用的解决技巧就无法领略，而这些都与复杂技术问题的解决具有密切的关联，绝非理论知识所能涵盖。而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素养是能否做好应用型科研的关键。

2.做好应用型科研需要建立应用导向评价机制。目前让教师从事应用型科研的困难比较大，因为目前科研评价主要侧重论文发表和纵向课题获取，对企业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关注不足，对学生应用型成长方向的关切也较为欠缺。因为这些都缺乏有效的衡量指标，恰恰这也是“双优”建设的难点与突破点所在，如果不能在这方面获得突破，“双优”建设的成效就难以达成。这要求“双优”建设要改变传统上以学术业绩进行排名的评价逻辑，转向以为企业作出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逻辑。高校为企业发展服务，就是实实在在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只有高校具有服务企业的能力才能扎扎实实地培养应用型人才，因为教师从事应用型科研的经历既可以转化为项目式教学素材，也可以转化为开展项目式教学能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就体现在学生参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就表现为学生一起参与探讨现实问题的活动中，通过群策群力的方式发挥他们的能动性，使他们的创造性潜能得以发挥，如此培养了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因而，应用型人才的

典型特质是创新创业能力非常强，敢于面对实际问题，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能够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不断成长。

3.应用型评价重在服务企业能力而非学历论文。应用型科研评价必然要关注科研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这两者是相对容易衡量的。然而这些并非全部指标，因为效益高低与市场环境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与企业自身的影响力关系密切。所以，科研评价的重点还在于科研成果所蕴含的技术含量或应用学术价值，也即是否创造性地解决了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这种价值往往不是短期可以衡量的，甚至是具有保密性的，无法用市场价值来衡量。因而评价尺度应兼顾当下与长远，进行综合评估，避免短视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定要排除唯论文、唯项目和唯学历的干扰，因为它容易把出身当成能力，把论文当成水平标志，把项目作为唯一标准，这种偏向于纯学术性的评价模式不适合应用型科研，也不适用于应用型高校发展水平评价，因为它不能鼓励教师向应用型教学和应用型科研转变，不能发挥有效的导向价值，更容易引向与研究型大学同质化评价的路径。

4.服务社会能力决定育人能力和社会反哺能力。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校的社会服务能力是“双优”建设的关键，也是决定高校发展的核心要素。从生态学角度看，高校发展好坏，其主要的观察变量应该是高校与社会之间是否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即社会是否大力支持高校发展，高校是否能够有效回馈社会。一旦高校通过培养大量的有用之才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社会对这些人才给予很大的褒奖，这些人才又反哺母校发展，这样自然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动态的平衡系统，从而会促使高校努

力去寻求为社会服务的发力点，进而带动高校教师通过研究和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展现自我科研能力，并且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从而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高创造力的人才，使他们都能够在社会上作出独特贡献。这样，高校就带动了社会发展，社会创造出大量财富来支持高校发展，高校又通过支持教师开展科研项目使自身充满竞争力，这种竞争力又为毕业生就业创造了更大的机遇，高校因此展现出优质的办学能力和优秀的服务区域发展水平。

由此可见，“双优”评价模式的构建应该是以应用型科研评价作为切入点，实现评价导向的根本性转变，这也是衡量“双优”评价模式建构的合理性依据。

六、结语

综上所述，“双优”工程启动意味着中国高校分类发展又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也使中国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初步形成了闭环。实事求是地说，“双优”评价模式建设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已经具有长期的实践探索基础，许多地区都对“双优”建设进行了前期探索并且摸索出不少有益的经验。这告诉我们，今天要构建“双优”评价模式，需要在总结应用型高校教师评价改革探索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突破。从现实经验的角度看，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实验是对构建“双优”评价模式进行的前期可行性探索。

参考文献：略。

（来源：2026 年第 7 期《江苏高教》）

推动应用型高校向“双优”目标迈进

中国教科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翟雪辰
中国教科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琳
中国教科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男星

应用型高校应充分发挥高校作为区域创新“策源地”与“连接器”的组织优势，主动对接地方政府产业规划与城市发展战略，形成“高校创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的紧密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转变。

“十五五”开局之年，应用型高校的发展建设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任务要求。近日，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推动我国应用型高校建设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双优”建设不仅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持久动力的战略举措。

一、内涵淬炼：激活改革发展新动能

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社会转型、服务产业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不容回避的是，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应用型高校陷入办学定位模糊、能力水平欠佳、发展路径同质化等困境。扭转这一局面的关键，在于坚守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将提升办学能力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走出一条创新引领的特色发展之路。

锚定应用型办学定位。应用

型高校建设的根本使命，在于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为此，高校必须厘清办学方向，锚定以应用为导向的科研与育人目标，系统探索融产教协同、能力本位、服务贡献于一体的发展模式，构建起区别于研究型高校与技能型院校的独特竞争优势。

地方高校作为应用型高校建设的绝对主体，具有立足区域、服务产业的天然地缘与资源优势。在实践中，地方高校应自觉将学校发展与区域发展、行业需求、产业升级紧密结合，聚焦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持续深化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在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锻造出鲜明的办学特色与核心竞争力。

切实增强办学能力。应用型高校办学能力的提升，应坚持“应用为本、服务为要”原则，在学科布局、师资建设、育人机制、治理体系等关键领域进行系统重构。

一是聚力培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集群。应用型高校应避免贪大求全的学科专业建设倾向，找准自身在区域产业布局中的竞争优势，着力构建与区域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优势特色学科群落，形成学科建设的集群优势。在改革实践中，应强化学科专业建设的顶层设计，以区域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布局方向作为学科专业设置的“导航图”，建立以“就业率、行业匹配度、产业贡献度”为核心的学科适配性评估机制，以产业需求倒逼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更新，将有限的办学资源集中投入优势学科领域。与此同时，立足优势学科领域，大力培育区域发展所需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领域，培养产业急需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二是夯实应用型师资队伍建

设。应用型高校应系统构建与自身发展路径相适应的教师分类发展机制，尊重教师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技术转化与服务等不同方向的发展选择，分类设计绩效考核、职称评审与激励标准，引导教师在各自优势领域实现深度积累与持续成长。健全高校与行业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一方面扩大企业高级工程师、技术骨干到校兼职授课和参与人才培养的规模与深度，另一方面建立并落实教师定期赴行业企业开展实践锻炼、技术服务的制度化安排，确保教师能够紧密跟踪产业技术演进和岗位能力需求。同时，还要注重优化专任教师队伍的整体学历层次和年龄结构，积极创造条件，支持青年教师挑大梁、担重任，营造鼓励创新、宽容探索的良好氛围。

三是深化实践育人机制改革。应用型高校应全面构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育人体系，将实践教学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具体来看，应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内涵建设，推动现代产业学院、专业特色学院等载体做实做强，促进校企协同育人常态化；加强高校与行业企业的联合培养，校企共建教学资源，共同开发活页式教材、实训指导书及在线课程资源等，确保教学内容与一线技术同步更新。同时，还要积极建设弹性开放、资源共享的学习空间，全面推进模块化课程体系与项目式教学模式改革，支持学生自主开展探究式、协作式学习。

四是构建产教协同治理体系。应用型高校要打破封闭式办学模式，构建与产业同频共振的治理新生态。具体而言，应在治理结构中扩大行业企业的参与度；将现代产业学院、专业特色学院作为治理改革的“特区”，赋予其在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师评聘上更大的自主权。为进一步提升组织响应能力，可针对跨学科

项目和技术转化团队推行“扁平化+矩阵式”管理，加快对接产业需求的节奏。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元化社会合作持续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实现办学经费来源的多样化。

全面提升服务贡献力。应用型高校是连接前沿知识生产与区域发展实践的纽带和桥梁，应主动将自我发展融入区域发展建设，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联合创新要素、关键创新枢纽和人才聚集高地。

一是推动构建“校政企城”联合创新生态系统。应用型高校应充分发挥高校作为区域创新“策源地”与“连接器”的组织优势，主动对接地方政府产业规划与城市发展战略，形成“高校创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的紧密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转变，切实提升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与效能。

二是打造立足前沿的区域关键创新枢纽。随着办学能力的不断提升，应用型高校应当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区域创新共同体的重要枢纽，提升自身在知识创新、服务决策、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贡献力。

三是构筑产教融合的区域人才集聚高地。在供给侧，应用型高校可通过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形成“专业+产业”的集群化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支撑区域主导产业发展的“人才库”。在聚集侧，可通过搭建科研平台、实施人才引进政策等，大力吸纳海内外学术大师、产业领军人才及高水平创新团队入驻，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跃升。同时，应用型高校还可面向区域内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开展继续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通过人才的“输入—培养—输出—反哺”闭环，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动能。

二、生态赋能：构建协同保障新格局

高水平应用型高校的改革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与保障。地方政府对资源投入机制、考核评价体系及区域产教融合的建设与完善，是推动应用型高校实现“双优”发展目标的关键外部支撑。

优化应用型高校资源配置机制。在中央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的政策指导下，各省份应立足本区域高校发展实际，以“双优”工程为牵引，加大对应用型高校的精准投入与持续支持力度，重点培育一批立足本地、服务行业的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和优势特色学科专业，推动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发展。

健全应用型高校发展评价体系。各省份应尽快建立健全应用型高校发展评价机制，构建体现应用型高校特征的评价指标体系，更加注重高校对地方和行业的服务贡献能力以及学生实习实践、科技成果转化等彰显应用型高校办学特征的相关指标。在评价指标中设置方向性标准、指导性标准、增值性标准等多元评价维度，适当增加学校自选权重指标、办学特色指标等，为学校特色化办学留足空间。与此同时，注重引入第三方评价和行业评价。

强化多方协同的产教融合政策激励。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协同推进：在应用型高校集聚区域组建区域性产教融合共同体，促进校际优势互补与集群发展，凝聚形成支撑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合力；加大对积极参与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企业的支持力度，以税收减免、财政补偿或专项奖励等扶持措施，切实激发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鼓励龙头企业投资办学，与应用型高校共建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和中试基地等，推动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和科研攻关。

（来源：2026 年 7 月 15 日《中国教育报》）

“双优”建设重构应用型本科价值坐标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 公钦正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结构优化、质量提升”转型。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构建“顶天、立地、托底”的高等教育体系，已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命题之一。“双优”建设的启动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政策体系正从顶层设计迈向全面落地，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开辟了一条独立且广阔的新赛道。

“双优”建设是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的战略举措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评价与资源配置偏向于研究型高校，这导致高校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学术轻应用、重理论轻转化、重论文轻实践”的同质化倾向。“双优”建设从制度层面打破了单一的“学术导向”评价标准，能够避免应用型本科高校被迫错位竞争、丢掉办学特色。同时，也有助于补齐短板，构建结构清晰、要素明确的高等教育体系，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需求。

过去，地方本科高校走应用型办学道路，往往面临双重合法性困境：一是社会认知层面，“应用型就是低层次”的偏见长期存在，导致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招生、就业、社会声誉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办学自主权层面，地方本科高校难以自主调整办学定位、学科专业设置和评价机制，存在“想转应用型却不知道怎么转”的困惑。“双优”建设通过国家政策的明确引导，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提供了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撑，使应用型转型有政策支持、有资源保障、有发展前景。

应用型高校完全可以办成高

水平大学

应用型高校与研究型高校的差异，本质是办学定位和职能侧重的不同，而非水平高低之分。应用型高校完全可以办成高水平大学。

从理论层面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创新链条的不同环节。在科学研究中，不存在完全脱离基础知识的应用研究，也不存在完全没有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研究型高校侧重“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应用型高校则侧重“从 1 到 100”的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二者都是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应用型高校开展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同样能够反映其科学研究水平。

从历史维度看，我国应用型办学有着深厚的根基与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大批行业类院校的办学初衷，就是面向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实际需求，培养能直接解决生产建设问题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这构成了我国应用型高校最宝贵的历史源头和办学基因。改革开放后大量升格的地方本科院校，其办学根基也深深扎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天然具有应用型基因和禀赋。“双优”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回归与升华，引导应用型高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服务地方的使命做得更深、更实、更高水平。

从国际实践看，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已是成熟的高等教育类型。无论是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法国大学校，还是英美的“创业型大学”，都是其所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这些学校所培养的工程师、技术专家、管理人才是支撑本国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社会认可度和收入水平并不低于研究型高校毕业生。其存在证明了应用型高校完全可以办成高水平大学，“应用

型”几乎已经成为当代大学取得成功而应普遍具备的办学特质。

以精准施策推动“双优”建设落地见效

“双优”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制度保障问题。

一方面，要促进应用型本科高校尽快找准定位、加强政策传播、形成建设意识。应用型本科高校首先要明确自身的赛道属性，进行深刻的自我定位，坚决摒弃对标研究型高校的惯性思维，不走“追学术排名”的错位发展路线。必须深刻认识到，“双优”建设比拼的是“育人力、科研力”与“服务力、贡献度”两个方面，前者以后者为根本动力、后者以前者为基础支撑。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要把提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度，作为办学的首要准则。人才培养层面，要重点围绕地方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突出知识迁移能力、转化能力和解决复杂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科学研究层面，要重点聚焦区域“卡脖子”技术、产业共性技术问题开展应用研究，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服务层面，要与区域文化和特色发展相适配，重点支撑区域文化传承、公共服务优化、地方治理提升。

另一方面，要尽快制定有别于“双一流”建设和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的评价标准体系，围绕“双优”建设提出遴选和评价指南。要围绕“办学能力优质”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两个核心维度，设计一套特色鲜明、彻底扭转传统学术化倾向的“双优”建设评价指南。在“办学能力优质”层面，不仅要看师资、经费、治理等的投入与过程，更要看培养的毕业生是否具备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知识迁移能力，看科研是否产出了能够转化落地的优质应用成果。在“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优秀”层面，必须用硬核数据说话：毕业生在本地就业的比例直接体现了人才供给贡献，与地方企业签订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反映了科技服务能力，智库报告被地方政府采纳的数量彰显了决策咨询价值，面向社会开放资源、开展培训的规模则体现了公共服务辐射力。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4 年度课题［AHAA24558］阶段性成果】

（来源：2026 年 8 月 26 日《中国教育报》）

以“双优”建设引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发展

聊城大学党委书记 白成林

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与“双一流”建设、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相互衔接、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中国特色、分类发展、多元协同的高等教育建设新格局，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加快从传统分层排序转向科学分类、特色发展的深层变革，引领各类高校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各尽其能。

“双优”建设的时代方位、理论逻辑与方法论

实施“双优”建设，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造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高地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提质增效的关键举措。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高等教育体系，但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双优”建设为应用型本科高校量身定制了契合类型定位、突出应用导向、强调贡献实绩的发展框架与评价标尺，引导应用型本科高校精准嵌入国家创新体系与区域发展布局。

从理论逻辑看，当前，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已从转型试点、数量扩容迈入提质创优、特色领跑新阶段，“双优”建设深度体现了本体价值与功能价值相统一、类型定位与系统生态相契合的办学规律。其中，“办学能力优质”是本体根基，决定了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是价值旨归，彰显高校的社会贡献。二者双向赋能，以办学能力夯实服务根基，以服务实践倒逼办学升级，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既守好大学之本又彰显大学之用，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适配度、服务行业

产业精准度、创新成果社会认可度。

从方法论层面看，“双优”建设牵引应用型本科高校实现三大办学范式转变。一是从跟随者到策源地，瞄准区域产业关键技术，推动高校与地方、行业企业共建区域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区域发展智库、工程技术创新中心、技术转移转化平台，成为技术创新与成果供给源头。二是从象牙塔到融合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和关键领域专业特色学院，构建校地共生、产教共融命运共同体。三是从标准化培养到个性化塑造，顺应技术变革趋势，强化学生核心素养。这三大转变，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倒逼自身办学理念、组织形态、评价体系的全方位重塑，是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系统性革命。

以优质办学能力筑牢战略支撑根基

推动人才培养从“标准化培养”走向“个性化塑造”，重构育人新生态。应用型本科高校要把行业标准与企业需求从“外部参照”转化为“内生要素”，构建“四链贯通”育人体系，推动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建构、从学科本位到产出导向、从供给驱动到需求牵引的系统性变革。

专业结构调整是个性化塑造的前提。应用型本科高校要主动对接区域产业升级需求，聚焦重点产业链，集中资源培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集群。聊城大学坚持“为产育人”，聚力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新能源与新材料等八大特色专业集群，以瘦身强体、集约提质实现精准适配。

产教融合是实现个性化培养的关键路径。应用型本科高校须推动校企从“点状合作”走向“系统共生”，让企业从“终端用户”变为“全程合伙人”，将生产线

变为实训场、实验室变为研发部。聊城大学建成 6 个省级现代产业学院，推行“课岗融通”，组织学生参与“科技副总”团队、乡村振兴服务等实践项目，努力培养能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推动学科建设从“大而全”走向“优而特”，锻造不可替代的科创品牌。应用型本科高校应聚焦优势、错位争先，将有限资源投向最具潜力、最对接区域需求的领域，以特制胜。聊城大学坚持“强研兴产”，聚力打造“系统智能+”“生物制造+”“能源材料+”“区域国别+”“马克思主义理论+”五大学科群，推动学科交叉融合，7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

高能级平台是学科登峰的关键支撑。应用型本科高校须在优势领域集中投入、前瞻布局，以平台聚人才、以人才促创新、以创新强学科，通过高能级平台整合创新资源、凝聚攻坚力量，推动学科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聊城大学聚力推动集聚国家级高水平人才，建强国家级高能级平台，并与重点学科群深度嵌合、同频共振，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源头技术供给。

推动师资队伍从“学术单一型”走向“产教双能型”，夯实办学核心支撑。应用型本科高校须打造既能站讲台又能进车间的高素质师资队伍，系统推动教师进企业挂职、参与研发。聊城大学健全“双能型”教师全链条培育机制，推动教师深度融入产业创新链条，培育出一批区域产业发展的“智囊团”与“技术尖兵”。

推动大学治理从“管理本位”走向“贡献导向”，激活办学内生动力。评价体系转型是关键。应用型本科高校须重构以“贡献”为核心的价值分配体系，提升技术转化、横向课题等业绩权重，摒弃唯论文、唯奖项。聊城大学

深化内部治理改革，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实绩实效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并将 15 项权责下放二级学院，推动职能部门提高服务能力，营造人心思进的办学氛围。

以优秀服务能力彰显战略支撑价值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是“双优”建设的价值旨归。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关键发力点是“从 1 到 N”的应用接力放大研究，应立足系统验证与成果应用，打通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的路径，在优势领域勇做“策源地”，破解区域产业“卡脖子”难题，实现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跃升。

推动科研转型从“论文导向”走向“贡献驱动”，以有组织科研赋能产业升级。应用型本科高校须坚守需求牵引、问题导向，引导教师走出“象牙塔”，深耕“从 1 到 N”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化应用。聊城大学建立标杆团队培育机制，围绕区域主导产业组建攻坚集群。生物制药领域自主研发 8 款新药实现进口替代，成功培育“鲁西黑驴”“聊红槐”等特色种质资源，已成为区域产业创新的“策源地”。

推动成果转化从“样品搁置”走向“产品落地”，打通创新闭环“最后一公里”。衡量服务能力的关键，在于成果能否跨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鸿沟。应用型本科高校须构筑全链条支撑体系，优化制度设计，扫清成果转化障碍，让转化者获得应有激励。聊城大学坚持“以产定研”，实施“科技副总”工程，累计派出 458 名科技特派员挂职 326 家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867 项，切实将科研优势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

推动校地关系从“表层合作”走向“深度融合”，构建相互赋能的“命运共同体”。应用型本科高校须推动校地合作从“资源

交换”到“生态共建”、从“项目合作”到“制度耦合”，实现发展规划与产业布局同频、学科专业与人才需求适配、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衔接。聊城大学精准对接国家战略，构建相互赋能、共生成就的校地融合新格局，积极推进服务健康中国战略的生物医药与现代农业研究、服务黄河战略与大运河文化带战略的黄河学运河学研究以及服务大国外交的区域国别研究，将办学成效最终落脚在支撑区域产业升级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上。

（来源：2026 年 8 月 26 日《中国教育报》）

“双优”工程视域里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几个核心问题

安徽艺术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柳友荣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师，副教授 何梦婷

摘　要：长期以来，我国应用型大学在如何抓准办学特色、提升办学能力、培养适配社会的应用型人才方面缺乏鲜明指引，导致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普遍存在定位不清、分界不明、特色不显等问题 。在此关键时刻，教育部启动“ 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 目标”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学界俗称“ 双优”工程 。 实现“ 办学能力优质”，关键在于明确高校类型区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重构课程知识体系；实现“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关键在于回应区域需求和推进扁平化管理改革。

关键词：“双优”工程；应用型大学；特色；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优化高校布局、分类推进改革、统筹学科设置”18 字方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均将“分类推进改革”细化为“按照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经过长期实践，已经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上确立了明晰方向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作为全国拥有本科高校（尤其是非“双一流”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体量最大的中部地区，如何找准办学定位，在分类办学中探索自身发展之路，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从教育源头助力“中部塌陷”变成“中部崛起”，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2026 年 3 月 7 日，教育部部

长怀进鹏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介绍，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学界俗称“双优”工程）。“双优”工程旨在完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体系，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破解应用型大学定位困境，引导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实现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服务国家区域发展的需要。对于长期处于“夹心层”发展困境的应用型大学和拥有此类高校体量超 1000 的中部地区而言，“双优”工程的启动恰逢其时，为我国应用型大学发展提供了明确牵引，补齐了三大类高校发展建设工程的最后一环，进一步凸显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导向。立足当下，我们虽然清楚“双优”工程包含的内容，但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才能让应用型大学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达到“办学能力优质”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即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还需厘清其内在建设逻辑。

一、“双优”工程的内涵与本质要求

什么是“办学能力”？此前学者虽已关注到“办学能力”在本科院校教育中的重要位置，但对办学能力包含的具体维度缺乏细致划分，仅能从有限文献和国家相关教育政策中窥知一二，如上海市教科院发展研究中心于 2003 年发布的《中国本科院校办学能力评估》,从生源与规模保障、师资与科研实力、教学与资源投入等方面对本科院校办学能力划分具体评估指标。近年来，学者们在关于教育强国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高校教育教学评估等研究中，基本将高校办学能力衡量标准聚焦于其办学方向把控能力、教学条件保障能力、师资保障支持能力、学科专业适配能力、科研学术发展能力、产教融

合创新能力、人才培养提质能力等方面。此外，从教育部 2021 年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教育部办公厅 2011 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体系》等文件中能看出，国家对高校办学能力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办学引领力、师资发展力、教学投入力、专业建设力、人才输出力等方面。可见，对高校“办学能力”的评价离不开人才培养效果、办学定位、教学投入力度和师资保障等衡量指标。

应用型大学要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而人才培养须依赖师资队伍水平和课程建设水平。所以，应用型大学的师资队伍应当具有产业色彩，而不能套用研究型高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思维；应用型大学的课程知识体系建设也需要强调市场导向，而不仅是依照学科性建构逻辑。

什么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区域，先要了解大学所在区域市场的核心需求，还要明确如何才能满足这些核心需求。

应用型大学建设的使命在于培养“应用”人才，这要求此类大学必须强调“应什么而用”，回答“应什么之需”—应区域发展之用，应产业发展之需。究其根本，应用型大学需要从“学术导向”转向“产业导向”，关注毕业生在区域内就业的比例，为行业企业解决了多少技术难题，成果转化创作了多少实际效益等。此外，大学长久以来的“科层制”组织机构模式，导致其难以对行业需求做出迅速响应，阻碍了应用型大学与企业的“深度绑定”。推动应用型大学率先进行内部组织机构模式改革，尝试“扁平化”改革，有助于提升此类大学回应行业企业需求的效率。

综上，应用型大学想要实现“办学能力优质”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应当在明确高校类型划分、提升师资队伍建设、重构课程知识体系建构逻辑、厘清“应”“用”之实，推动内部组织结构形态转变等方面找到精准发力点。

二、建设“双优”工程需处理好的问题

处理好类型划分问题，即要明确应用型大学的“类”不等于“型”。处理好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即要区分“师资”与“队伍”的概念。处理好课程知识体系建构逻辑的问题，即要转变以往的建构思路，突出“受雇性”建构导向。处理好“应”与“用”的问题，即要平衡文化素养和市场导向的关系。处理好内部组织结构形态转变的问题，即要以“扁平化”改革思路，帮助应用型大学尽快融入社会。

（一）“应用型”大学的“类”之名并不等于“型”之实

长久以来，我国应用型大学对“类”和“型”未做出明确区分，往往以为自己有了“类”就自然有了“型”，而忽视了“型”的实质，甚至以为应用型大学只要与企业对接，便完成了创办“应用”这一类型大学的使命。实质上，每所应用型大学都要有自己的“型”。所谓“型”，应是这所大学的办学基调，也是它具有辨识度的特色之处。

1. 引导高校建设“类”“型”兼备是推动分类改革的内在意蕴

纵观近 40 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高等院校分类的研究与探索，人们虽然在意识层面上对高校需要且应当分类已经达成共识，但对“类”与“型”的本质区别却存在认知偏差。其一，将“分类”等同于“分型”，模糊“类”与“型”的界限。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的办学定位区分，是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对

大学进行的划分，但即使是同一类别，比如应用型大学，还需在类别划分的指导下确定本校的发展特色，并在学校定位、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社会贡献等方面进行进一步区别。其二，多数应用型大学虽然清楚自己属于“应用”这一类，且着力于培养“应用型”人才，但并未找准本校的优势与特色，培养的学生缺乏市场竞争力；有的应用型大学在人才培养上仅限于强调技能应用，与同样强调应用导向的职业技能型大学难以做出区分;或是以“本科层次”为由盲目向研究型大学靠拢，违背分类发展初衷。其三，部分高校并未切实结合区域产业需求和区域特点制定学校发展规划、谋划学科布局，要么盲目追求“大而全”，要么照搬照抄其他同类高校经验，导致出现“有类同型”的情况。实际上，“类”与“型”代表两个不同维度，并非“有类”即“有型”，所以，高校亟待在分类之上确定“分型”。

从词源上看，“型”源自古希腊的“共相／理念”或“形式”。后来，“型”逐渐演变为“类型”“典型”“范型”等。无论古代的“共相”，还是现代的“范型”，它们都具有“型”的共同特征，即现实性和客观性。一方面，“型”是真实客观的存在者，是“现实”物；另一方面，“型”又负载着主体的期待、意志和愿望，渗透着理论观察和价值判断，更附有社会、人文、历史要素。以此来看，应用型大学的“型”不能沦为一种大而化之的分类，它应当是区域社会的型和学科专业的型之结合，即在认真审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上，积极与产业前沿对接，对准人才缺口，展开学科布局和专业选择，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实用性，如对文物考古有需求的区域，其所属及附近区域内的应用型大学可以瞄准历史学学科门类中的历史学、考古

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等专业。这种“型”既离不开区域特性，又基于学科基础。

此外，“应用型”大学的“型”不应该是已经成型、结构固定、维度清晰、可以静观的现实存在物，而是被高等教育实践验证的现实存在，能够反映对传统大学模式的一次次突破，如我国常熟理工学院在设置“电梯工程与管理”专业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战略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成立了电梯学院。克拉克在研究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时指出，“如果社会不能从已存在的社会机构中得之所需，就必然地催生新的机构，来替代原有的旧组织”。作为现代社会关键组织载体，高校兼具社会变革引领力与发展调适力，牵动社会发展核心脉络，其发展也必然要与社会同频，与时代同频。

2.找准“型”之特色是应用型大学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要义

从实践层面来看，教育领域对高校办学能力已经形成一套较为程式化的评判标准，这些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高校办学走上正规化、体系化的发展道路。在工业社会时期，面对教育批量化生产，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评判是基于竞争与筛选体制之上的绩优主义和绩效主义。进入数字化社会，人们对“一般”“普遍”“同质”的需求大大降低，流水线量产模式不再具有竞争优势，甚至面临被行业领域淘汰的尴尬境遇。“与工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或知识经济在本质上是精英式的，对产品独特性的强调胜于数量。”这一切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独异性”思维成为数字社会新的要求与衡量标准，社会对“独异性”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

瑞士应用科学大学和澳大利亚应用型大学的办学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找准有别于传统学校的发展方向，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

专属强项，才能在日益激烈和多变的教育环境中博得长远发展的空间与潜力。瑞士应用科学大学在办学方面，以突出特色为先，每一所大学及下属二级学院都有特色专业和特色教育。澳大利亚应用型大学强调教师应适时转变身份，成为学生的合作者和辅助者，重视为学生设计丰富的“学习体验”，为不同需求的学生开设“辅助课程”，并设有专门的辅助课程认证机构对此类课程进行审定，以保证在教育过程中牢牢把握“以生为本”的理念。在我国，合肥学院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已在区域特色化发展道路上形成了品牌影响力。其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地方需求高度适配，本科专业紧密对接合肥汽车及工程机械、家用电器等支柱产业，形成以经、工、管为主的专业结构，毕业生主要留在本市工作，德国大众轮胎等企业落户合肥的重要原因就是该校能提供适配的毕业生；同时，其国际合作资源丰富，与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合作历史悠久，引入德国先进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国际交流覆盖多个国家，相关合作模式获教育部肯定。

教育部发布的《2024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24 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 3119 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 1257 所（含独立学院 154 所）。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4846 万人，普通本科学校校均规模 17428 人。全国共有普通本科高等教育专任教师 138.76 万人。目前，我国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而“有质量”将不再体现为规模量产，它必须要符合社会需求，符合时代发展，且具有自身类型特色。基于全球最大的教育体系，推进高校分类分型建设，让相应组织承担相应人才培养任务，服务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我国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

作为应用型高校，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目前究竟是什么“型”，未来定位是什么“型”，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大而不强、同质严重、结构失衡”的深层矛盾，破解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两张皮”的现实困境，推动教育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差异化、特色性、高质量发展。

（二）从关注“师资”到重视“队伍”

应用型大学让“师资”成为“队伍”，让师资队伍从“有”到“优”，既要遵循建设师资队伍的底层逻辑—学科思维，也要重视补充优化应用型大学师资队伍的关键力量—外聘教师。

1.学科思维：高校搭建师资队伍的内在逻辑

师资队伍建设及保障作为高校办学能力的评价指标之一一直备受关注，但部分大学对师资队伍的认识存在误区，以为有了“师资”就必然会有“队伍”。实质上，“师资”是从数量上考虑，“队伍”是从结构上考虑。作为承担高校主要育人职责的教师，其基本素养、师德师风、教学能力等是衡量其综合水平的重要标准。但教师个体的成长并不代表师资队伍的成长，教师个体的成功也并不能代表师资队伍建设的成功。想要“师资”成为“队伍”，需从多方发力，不是单向度关注教师队伍的体量、教师个体的学历层次等的增长或调整，而是集中精力加强师资队伍内涵化建设。

这就需要秉承“学科思维”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学科思维”可以帮助团队教师聚焦研究领域，锚定学术目标，深挖学科特色，形成竞争优势；可以成为青年教师在职业发展道路上的灯塔，实现人才的代际传承；可以助力团队将学科知识转化为育人内容，无缝对接教学科研。只有内部结构合理、稳定，有朝气、有潜力的学科队伍，才能够为团队教师

提供发展平台，增强教师的归属感，从而为高校建设带来生机与活力。

2.外聘教师：应用型大学师资队伍的必要补充

从客观需求来看，一方面，服务区域的要求倒逼应用型大学通过引进实践精英与产业高度对接，完成培养适配区域人才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给包括高校教师资源、实验室资源等的饱和供给制造了难题，需要出现师资补充性机制以弥补需求不足。克罗斯提出“外聘教师取代终身制教师的趋势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各机构寻求资金、人员和学术上的灵活性，而环境机会和必要性的结合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灵活性”。从现实发展来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国，外聘教师在高等教育教师中的比例都在不断增加。美国高校教师统计数据显示，1995—2015 年教师总数增长 66.6%,其中，全职教师增长 46.5%,外聘教师增长 95.6%。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数据显示，1976—1995 年，我国大学外聘教师数量增加了 91%,而全职教师的数量在同一时期仅增加了 27%。另外，教育部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中心 2020、2021 年开展的合格评估院校的教师状况统计分析显示，有超过 1/3 的教师属于外聘。可见，外聘教师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存在，如果继续让如此体量的外聘教师游离于高校教师队伍之外，不正视外聘教师的身份，不将其纳入师资队伍管理之中，那么就无法对外聘教师进行专业化、体系化训练。从政策导向来看，2015 年《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2017 年《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 2022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均已指出，支持高校引进行业人才以专业带头人、专职教师、兼职教师、产

业导师等身份到校任教，尤其支持应用型高校探索此类教师的引进标准和评聘办法。2025 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普通本科高校产业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对外聘教师的聘请条件、聘请程序、工作任务、政策保障等给予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指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激发创新创造动力和活力。由此可见，外聘教师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企业人才交流的重要通道。

当下，外聘教师已成为应用型大学快速发展的“衍生物”，但是大学管理者们对外聘教师重要性的认识仍与实际需求脱轨。应用型大学外聘教师的聘用基本上是师资补偿性的，少有依据人才培养方案的学科能力建设和专业实践技能培养，系统谋划外聘借智问题，建设性、创造性地解决应用型大学的师资队伍建设。他们在现实中存在身份认可度低、教学要求不高、薪资酬劳不优、情感连接不密、考核评价虚化等问题。总而言之，队伍归属感匮乏削弱了他们的职业责任感，他们实际成了学校的“边缘人”乃至“局外人”，致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甚至诱发道德风险。与教师队伍主要来源于自有教师的研究型大学不同，应用型大学的“应”是回应社会需求，这种回应仅靠学校自有教师是无法支撑的，即使是将教师送出去挂职、顶岗、培训、交流等，这些短暂的、非持续性的对外界需求的了解也无法真正做到推倒校园围墙的边界，与行业深度融合。为了与行业前沿保持深度互动，应用型大学需要这些最前沿的人作为师资队伍的必要补充，进入大学、走入课堂、融入教学、加入队伍，成为应用型大学的“局内人”。

（三）课程知识体系建构：从“学科性”逻辑转向“受雇性”逻辑

“双优”工程要求以优秀的办学能力服务区域地方发展，这就需要了解区域市场、重视区域行业发展需求，以需求为课程知识建构体系原点，反向设计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受雇性”价值，激发学生的社会认同感，降低学生的就业不安感。

1.我国高等教育建构知识体系的传统惯性

目前我国高校知识体系建构总体上以“学科性”为核心主导，遵循学科分类逻辑，以学科为基本单元划分知识领域，设置教学与研究体系，这是由高等教育的学术属性和人才培养规律决定的。具体以学科分类为基础划分院系、设置专业，每个学科对应一套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明确核心知识、基础理论、专业技能的层级结构。知识传递也围绕学科展开，包括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实施等，均以学科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为核心，确保学生掌握本学科知识，形成符合学科要求的思维方式与能力素养。

不可否认，以学科性为主导的课程知识体系建构，在保障知识传递的系统性、厘清学科边界、强化人才培养的专业性、提升办学质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建构模式在面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革的当下，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比如，学科壁垒明显、育人目标单一，应用导向不足、脱离产业实际，知识更新滞后、社会反应迟滞，限制办学特色、同质现象明显等。究其根本，学科性逻辑完全不存在对区域性、地方性因素的考量，而应用型大学的培养目标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纯学科的课程建构逻辑缺乏本地可应用性，无法完全融合对地方实际需求的考量。

2.要让“受雇性”逻辑成为课程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

作为知识技能输出的最小单元，课程内容实质上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方向、方式和效果。高校课程知识体系建设的逻辑并非亘古不变，它应当随高等教育环境的变化而变迁。在分类分型的教育理念下，建构知识体系的逻辑方式应适应时代需求，以学生培养的实际成果为导向。成果导向的核心是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评价导向，聚焦学生学到了什么，而非教师教了什么。这本质上是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原则，检测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用性与适应性，具有明显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性。也就是说，想要达到社会适配，要先明确学生毕业时需具备的行业能力需求及社会期待，再以此为逻辑起点，反向设计课程内容、教学策略与评价方式等，确保课程知识、教学过程均能支撑达成预期学习成果，让“受雇性”逻辑变成大学人才使用逻辑。

在高等教育场景中，受雇性“不仅是获得和维持满意工作的能力，更是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自主流动，通过可持续就业充分发挥自身潜力的综合能力”。它并非单纯的就业技能培训，而是高等教育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社会适应性和区域贡献能力的培育，能有效帮助学生应对终身职业发展的挑战。以“受雇性”逻辑建构课程知识体系在澳大利亚部分大学已有验证经验，其根据专业学习目标和毕业生“受雇性”要求，严格按照项目学习结果、课程学习预期成果、课程内容、评估等环节来审查课程开设效果。其中，悉尼科技大学提出课程设计思维的理念，通过调研，拟定本校毕业生个人能力框架，并据此来设置本校学生的课程体系。这样的课程设置思路势必有助于大学毕业生获得社会需要的能力

素养，以满足未来的职场要求。

我国应用型大学如何能让“受雇性”逻辑成为课程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其一，要增加产教融合课程。根据教育部新建本科院校常模指标来看，自选指标中“与行业企业共建、共同讲授”的课程数需达到 69.2,课程数值越高则越能体现出产教融合深度，可在专业课程中针对性融入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关的能力要素，设计专门模块培养学生可受雇性能力。在公共课程中，大一统的就业指导课程对不同专业学生效果不明显，多数课程仅是职业生涯规划和选择的纸上谈兵，几乎未产生任何实际意义，反而成为学生口中的“水课”。为改变这一现状，高校应邀请用人单位将企业实际经验和要求融入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根据企业需求制定受雇性能力培养方案并与学校对接设计课程内容，与行业企业共建、共同讲授课程。其二，我国高校与企业的合作育人基本处于“终端嵌入”模式，尚停留在高校“实习驱动”、企业“用工驱动”上，缺乏全程介入，应通过共建企业研发中心及重点实验室，让师生参与到实际市场项目中，可以创建校企互派互换互融机制，校企双方共同介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行高校与企业“双主体”育人模式。

与此同时，遵循“受雇性”逻辑也应避免单一以市场为人才培养导向，防止将就业率作为人才输出评价的唯一指标。AI 时代的大学，本质上是要培养学生的“元知识”与“根能力”。“元知识是知识的底层逻辑和总规则，是超越具体学科与领域的认知框架。根能力是人本能力，其覆盖范围贯穿智力、心性、情感、意志、品格、价值、行动力等多个维度，是人的综合素养的集中体现，决定了其在 AI 时代的不可替代性。”对大学而言，培养学生

认识知识而不只是接受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贯穿运用而不只会固定解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辩证思考而不只是片面看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心绪稳定而不随波逐流的能力，这些能力是学生在数智时代的立身之本。应用型大学的“受雇性”逻辑，不仅要体现在与地方区域相适配，服务本地行业企业发展，更需强调将学生作为社会个体的存在展开全面培养。

（四）要重视科学发展之“用”，也要“应”区域发展之需

长期以来，我国应用型大学在办学定位中存在将“用”等同于“应用”的认知谬误，制约了办学思维，影响了学科专业建设。应用型大学既要有“用”的思维—开办实用性、技能性专业，也要以他者中心思维“回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开办区域所需、所急的专业。应用型大学亦不能局限于技能教育，还须重视那些可能被市场视为“无用”，但对人才底色塑造起关键决定作用的知识。

1. 应用型大学办学仅体现“用”之思维的局限性

我国应用型大学对如何体现“应用”的办学理念认知多停留在浅表，以为开办有“用”（技能）的专业就能使“应用型”办学效果落地生根。实际上，大多应用型大学创办应用型专业都是围绕自身办学基础或传统，这些均是从“自我”角度出发规划办学，强行将开办应用型专业的需求与本校的实操便利性相挂钩，未能回应区域需求、行业需要及社会期待。

应用型大学不能只重视学科专业中对“用”的体现，不能以我为中心办学，还需有他者思维。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一批新型大学与区域内政府和企业相互融合，为区域服务，发起了“他者

中心”的“相互作用大学运动”，大学直接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

2.应用型大学“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需的必要性

应用型大学的“应”实质上是回应区域社会之需，也是其区别于研究型高校、职业技能型高校的关键，直指当前高校分类中“分型界定模糊、分类缺乏细化”的痛点。美国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的著名观点“州的边界就是大学的边界”曾明确阐述美国州立大学的根本使命是服务本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培养的人才也应首先满足本州需求、能够解决本州的实际问题。从世界大学的发展轨迹也可看出，回应区域社会之需是应用型大学的必然选择。

所谓“回应”，第一，要回应教育改革之急。遵循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发展趋势，适配“分类办学、特色发展”的高等教育分类要求，坚守本科层次教育定位，既要夯实本科阶段的理论基础，也要从规划源头纠治“重科学、轻技术”的发展倾向，制定明晰的办学发展路径，贴合自身办学实际。第二，要回应区域创新之需。顺应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紧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对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摒弃学科布局“大而全”的粗放模式，避免盲目向研究型攀升的定位偏差。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及应用能力，服务地方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第三，要回应区域产业之要。适配办学所在地的区域经济特点，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做强区域急需专业，淘汰不适应专业，推进学科专业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需求深度融合，破解“定位缺乏细化、千校一面”的同质化问题，围绕区域产业需求打造特色专业、培育适配人才，凸显地方服务属性。第四，要回应区域民生之务。要直面社会普

遍关注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人才供需错位、毕业生能力适配不足等现实问题，响应产业具体岗位的能力要求，兼顾岗位实操能力与职业发展能力，与职业技能型高校形成梯度，厘清应用型与职业技能型高校的培养边界，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应特别注意避免学科与专业低水平重复现象的出现，充分利用区域人才、社会、环境等各类资源，凸显特色。

应用型高校发展还要扎根中国大地。首先，从教育目标来看，建设教育强国需要创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等院校。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 40 年的艾略特说：“美国大学不可能是英国、法国或德国大学的复制品，它必须生长在自己的土地上，具有独创性，符合美国社会和政治风俗。”如此看来，“世界一流”的标准是一个不断丰富的“实在物”，需要一个个具体的“本土”方案来充盈，需要更多的“本土”智慧。其次，从国际形势来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想要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更需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发展之路，而非单纯跟随、复制或套用他国已有经验。因此，选择符合我国国情和具有我国文化基因的高等教育是本质使然。最后，从教育学科的发展源头来看，教育学区别于传统经典学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实践性理论”。也就是说，教育理论研究必须扎根“此时此地”，即使有“彼时彼地”的理论研究方式和成果植入，也应该以同化、顺应本地需求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

3.“无用知识”也是应用型大学的立身之本

应用型大学虽然追求人才培

养与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重视实用性、技能性、适用性，但究其根本，“应用型”不是“功利型”，应用型大学不是为行业生产适配人才的“加工厂”。长久以来，实用主义理念的兴盛，让社会对“博雅通识”的追求产生了距离。尤其在进入 AI 智媒时代，行业对高校毕业生“能上手”“懂技术”的强烈需求，让人们对基础理论知识产生了“无用”的错觉。

弗莱克斯纳曾提出探索“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将“无用知识”解释为并非追求当下实用目的，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所进行的基础研究、纯理论知识或自由学术探索；将“有用性”解释为当下看似无用，但长期会产生不可预见、颠覆性、根本性的大用，是技术革命与社会进步的真正源头。

应用型大学培养的学生，不能仅关注培养其技术操作能力，更需教授其背后的伦理内涵。工程类专业学生，需聚焦培养其在公共安全、生命权益、生态环境及社会福祉等方面的责任担当，帮助其理解在协调工程活动中对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认知；对文科类学生的培养需侧重公共表达规范、人文关怀、隐私保护等伦理教育，这些非实际应用性的、偏理论化、看似“无用”的知识，也是应用型大学的立身之本。

那么对于应用型大学而言，如何让“无用知识”成为区域应用教育的不竭源泉？其核心当以“区域 + 校本”为抓手，以“源于地方、惠于地方”为原则，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博雅通识教育资源，深挖在地特质，最终反哺教育建设、服务区域发展。通过对区域历史文化特色的梳理，对本土名人精神内核的提炼，对地方民风民俗的理解等，形成区域社会、文化、伦理等通识教学资

源；结合本校发展历史、校园文化气质，编写校本教材，形成独有的教学内容体系，突破统编教材通用性强、针对性不足的局限。最终，以“区域 + 校本”实现区别办学、特色办学，让看似“无用”的知识成为区域人才的能力根基和价值底色。

（五）突破“科层制”，实现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形态的“扁平化”

应用型大学的治理模式需与办学定位、人才培养路径高度适配。“扁平化”管理模式作为现代组织治理理论中的重要优化范式，基于“科层制”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已成为应用型大学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强化办学特色的核心改革举措。

1.“扁平化”模式是应用型大学满足服务区域发展的标配

我国现行的大学管理模式源自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的高等院校，实质上是机械沿用了科层制。它建构了“学校—二级学院（行政部门）—系部—教研室”的金字塔般的垂直组织结构。这一管理模式虽然能为各个单元相对独立、相互封闭的组织机构带来管理优绩，有利于组织内部行政命令与执行，但其存在管理层级冗杂，手续繁多；部门横向管理范围较小，纵向管理深度不够；金字塔式的权力集中，体制僵等等问题，延滞了信息的纵向传递，“碾压”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作质量，必然给应用型大学发展带来局限。

应用型大学是以服务区域为核心，必须与社会高频互动，及时对接和响应区域市场需求。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在对接产业需求时，显得效率低下、拖沓散漫，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式能够提高组织运转效益，适配社会对应用型大学的需求与期待。首先，“扁平化”抛弃了决策链长、

反应迟缓的组织决策程序，可有效缩短决策与执行的传导周期，提升管理响应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其次，二级学院、系部或教研室作为人才培养、知识传导的一线载体，直接对接行业企业资源与师生需求。“扁平化”为基层赋权，能够直接调动基层办学活力。最后，服务区域发展是应用型大学的命脉所在，“扁平化”能够有效推动基层组织自主回应区域需求，推进课程改革、产教融合，提升应用型大学服务区域发展的针对性、实效性与精准度，实现办学定位与区域需求的深度融合。目前，应用型大学在与行业企业融合过程中，最大的行为障碍可能就表现在大学内部决策繁复的过程上。“扁平化”改革可以解决决策与行动间的“时滞问题”，有效回避决策和执行中的繁文缛节导致的信息传递失真现象，促进学术组织的横向交流，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应用型大学有限的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2.如何实现应用型大学“扁平化”管理

一是精简层级，缩短耗时。推行“教务科研部门—教研室”两级管理模式，让学校教学科研行政部门直接对接教研室，教研室同时服务于二级学院和行政部门，打破自上而下的条条框框；整合行政机关职能交叉、业务重叠的部门，削减层级，抹去中间环节，加快信息流转；打破学科、专业固有的边界，实行“大学部制”，亲近行业需求，方便学生成长，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是权力下移，照单追责。将行政管理重心下移，打破繁复的层级框架，破解遇事总是令出多门，相互推诿扯皮的难题，提高信息反馈速度与频度，凸显合作、对话与分享的现代大学治理理念；建立岗位责任清单，依岗定责，岗责统一，按岗履职，照单追责，

促进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过渡，提高管理效率和工作绩效。三是协同联动，闭环运行。核心是解决“扁平化”改革后权力下放、架构优化带来的运行衔接不畅、流程闭环不足等衍生问题。依托智慧校园平台，整合教学、科研、行政等各类管理数据，实现跨部门、跨学院互通共享，打破信息孤岛；对校企合作审批、人员交流互动、运转经费拨付等高频事项，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全程留痕”机制，明确各环节责任主体与办理时限，提升运转效率；四是筑牢保障，防控风险。聚焦构建“扁平化”改革的支撑体系，完善校院权责管理办法、基层经费使用细则等配套制度，强化数据共享的技术支撑;关注审计监督与成效评估，及时纠正权力运行偏差，核心是解决“放权不放任、改革能落地、长效能坚持”的问题，为“扁平化”改革提供全方位支撑。现代大学已经是一个机构庞大、结构庞杂的组织系统，拓宽管理幅度和缩减管理层次，应该是大学治理的题中之意。对于走出了“象牙塔”的应用型大学而言，面对比校园环境复杂得多的社会，想要尽快融入其中，尤其需突破传统组织结构范式，提高自身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略。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教学投入研究”（项目编号：21YJA880041）。】

（来源：2026 年 9 月第 5 期《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破局“中部塌陷”：应用型本科“双优”建设的身份重构与路径突围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教研究》主编 王小梅

摘　要：长期以来，我国应用型本科处于研究型大学与高职院校的中间地带。相较于研究型大学的“双一流”和职业教育的“双高计划”建设，应用型本科重点建设项目长期缺位，面临高等教育“中部塌陷”的结构性风险。基于应用型本科“双优”建设的身份之问、内涵之问与生存之问展开系统剖析，旨在厘清职业本科与应用型本科的边界分野，确立应用型本科“知识应用导向”的身份定位；探讨应用型本科教育“应用性”与“适用性”的辩证统一，提出“三个转化”的内涵式发展路径；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约束，构建资源困境突破、特色专业打造、跨区域协作、分类评价四位一体的生存策略。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双优”建设；“中部塌陷”；产教融合

一、问题的提出

20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以下简称“纲要”），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全面系统的战略部署。《纲要》明确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2026 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民生主题记者会上提出，启动实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其目标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内核，被学界俗称为“双优”工程。所谓“双优”，即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这一政策信号，对全国千余所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而言，不仅是体制机制改革的政策东风，更构成破解长期资源瓶颈的战略性补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体系中最后一块“制度拼图”的正式归位。

然而，剖析这一政策出台的深层逻辑，必须直面长期以来我

国高等教育结构呈现的“中部塌陷”失衡态势。在高等教育层级谱系上，顶端是致力于基础科学探索与原始创新的“双一流”研究型大学，享有充足的国家财政支持与优质生源；底端是聚焦技术技能标准化操作与技能创新的高等职业院校，形成了产教融合与就业导向兼具的鲜明职教特色。而处于中间层的庞大应用型本科高校群体，则长期陷入“身份模糊”与“资源匮乏”的边缘化状态，呈现出“中部塌陷”的结构性特征。

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审视，“中部塌陷”是高等教育场域中“制度同构”的必然结果。“同构是一个限制性过程，它迫使一个种群中的某一单位与面临相同环境条件的其他单位相类似。”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独立且具有法定效力的分类评价体系，为获取办学合法性与有限资源，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同构机制的驱动下，被迫卷入单一的学术评价赛道，面临“双向漂移”的困境。其一是向上的“学术漂移”：部分地方本科高校盲目模仿研究型大学，追求高、大、全的学科建制，导致办学定位偏离地方实际，在资源竞争中削弱了服务地方的导向；其二是向下的“职业漂移”：面对职业教育的强势发展与严峻的就业压力，部分应用型本科高校试图通过减少理论课程、增加实训学时以响应市场需求，导致其办学形态趋向于职业教育的延伸，进一步加剧其人才培养体系的“先天性落后”。

这种既不能“顶天”（实现学术创新突破）又不能“立地”（扎根行业一线）的结构性“中部塌陷”，不仅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整体效能，影响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更难以满足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迭代、新质生产力加速形

成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知识结构与能力素养提出的全新要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双优”建设工程的提出，迫切需要应用型本科高校回答好“身份之问”“内涵之问”以及“生存之问”等根本性问题。这是“双优”建设工程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所在。

二、身份之问—职业本科与应用型本科的边界与分野

在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迈入普及化的进程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双轨并行”的宏观结构已然确立。应用本科与职业本科同属本科层次，二者在办学理念上均强调“服务地方”“产教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等。根据组织生态学，当两个组织利用同一资源时，必然出现生态位重叠；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完全重叠的生态位无法长期共存。厘清二者的核心边界，确立不可替代的独立生态位，是应用型本科在“双优”建设中破解“中部塌陷”困局的首要前提。

（一）生态位危机：职业本科跨越式发展带来的结构性挤压

理解应用型本科当前面临的身份焦虑，必须重视外部制度环境变迁及其导致的资源挤压效应。2022 年 4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条文形式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一法律定位破除了“职业教育只是普通教育的补充，地位低于普通教育”的陈旧认知，赋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二者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

伴随法律地位的确立，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自 2019 年 12 月教育部批复同意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大学以来，截至 2026 年 5 月，全国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已达到 124 所。目前，职

业本科院校的来源日趋多元：从初期民办高职升格，到独立学院与公办高职（专科）学校合并设立，再到以公办职业院校为基础直接设立。尤其是 2022 年以来，“双高计划”建设学校成为新建职业本科院校的主力。这些院校具备良好的办学实力和产教融合水平，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当前，尽管国家政策层面强调应用型本科与职业本科“异类”发展，但从实际办学看，二者更趋于“同型”，在培养目标、产教融合路径、校企合作模式等方面呈现高度趋同化。若不加区分，应用型本科与职业本科将在生源、财政拨款、行业合作等关键资源获取上陷入零和博弈。

（二）制度化同构：政策时间差下的路径依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实行重点建设政策。从建国初期的重点高校制度，到“211 工程”“985 工程”，再到如今的“双一流”建设，国家通过集中资源、分阶段推进，显著提升了顶尖高校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在重点建设政策规划下，高等教育分类建设经历了从“塔尖”（研究型大学）到“底座”（高职院校）再到“中部”（应用型本科）的渐进过程。

“双一流”建设于 2015 年启动，通过国家战略驱动的资源集聚与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格局与角色，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部分领域的“领跑”转变，逐渐形成国家主导与学术自主相结合、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色相统一的多元使命相协同的“中国模式”。“双高计划”于 2019 年年底启动，首轮（2019—2023 年）中央与地方累计投入超 700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形成 1:6 杠杆效应，建成 197 所高水平高职学校、253 个高水平专业群，覆

盖 18 个专业大类。“双高计划”建设学校在办学能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质的飞跃，凝练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职教改革经验。相较于“双一流”和“双高计划”建设项目的先行一步，“双优”工程虽然姗姗来迟，但其背后恰恰反映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深层战略考量。

这种“政策时间差”深刻影响了应用型本科的发展轨迹。先发制度具有强大的自我强化与锁定效应。“双一流”塑造了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标准，坚持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相统一，突出内涵发展与实际贡献，多元多维、动态调整的评价体系；“双高计划”确立了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产业发展为导向，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核心，通过“六个度”多维评价，全面衡量职业院校育人水平、服务能力与实际贡献的评价标准。那么，长期处于政策边缘的应用型本科，在上述双重话语体系夹击下陷入“制度同构”陷阱—为获取合法性与生存资源，不可避免地模仿成功组织的结构模式，从而产生“双向漂移”现象。“双优”建设必须打破这一路径依赖，确立应用型本科独立自主的发展坐标。

（三）认识论分野：技能训练的具象性与知识转化的抽象性

要规避同质化与“双向漂移”的风险，关键在于从认识论层面厘清应用型本科与职业本科在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上的本质区别。

第一，目标导向的底层逻辑差异。职业本科遵循“从岗位到岗位”的线性路径，底层逻辑是就业导向。它强调技术技能在特定岗位上的熟练度、规范性，解决具象化的“怎么做”问题，其人才培养目标是能够精准匹配生产线需求的“现场工程师”和“能工巧匠”。应用型本科则遵循“从

学科到行业”的路径，底层逻辑是知识应用导向。它基于相对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和社会问题，不仅要求掌握“怎么做”，更要求探究“为什么这样做”，其人才培养目标是具备理论厚度与系统思维的“技术领军人才”和“行业骨干”。

第二，知识转化逻辑的本质差异。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将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职业本科高度依赖于在真实或仿真工作情境中对“默会知识”的师徒制传承与经验累积，侧重于标准化操作规程的执行与渐进式技术改良。如将国家科技创新链进行阶段划分，研究型大学关注“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应用型本科与职业本科共同承担“从 1 到 10”的成果转化：前者侧重“前端”的技术转移与工艺设计，后者侧重“后端”的设备装配与现场实施。这种中试转化能力是跨越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大幅提升产业化成功率的关键。由此，职业本科追求岗位技能的“专精”，应用型本科则是跨学科复合性与理论基础的统一。在“双优”建设中，应用型本科必须守住学科完整性，防止“职业漂移”，同时学习借鉴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的成熟经验。

三、内涵之问—“应用性”与“适用性”的辩证统一

厘清身份后，核心命题转向内涵建设。如何实现“双优”建设的总体目标，关键在于深刻理解并处理好“应用性”与“适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哲学基础与知识模式变革：应用性与适用性的内在统一

“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探讨的是“内在本质属性”与“外在社会功用”的问题。具体到应用型本科教育，“应用性”是其办学

的根本属性与学术底色，即“体”；“适用性”则是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即“用”。

在人才培养实践中，“应用”有时被简单等同于低技能的动手操作，这是对“应用”的矮化。“知识生产模式Ⅱ”理论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应用性”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区别于传统“知识生产模式Ⅰ”以单一学科为中心、在封闭学术环境中进行的纯基础研究，“知识生产模式Ⅱ”强调在“应用语境”下，以解决复杂现实问题为导向，由高校、企业、政府等多主体共同参与跨学科知识生产。真正的“应用性”应当是基于科学原理的技术再造与基于行业标准的工程应用，是将抽象理论投射于真实世界复杂系统中的高阶学术活动。同时，“适用性”构成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外显价值。产业周期、技术前沿、社会结构在快速迭代，应用型高校的“适用性”必须随之而变，某种程度上还需适度超前，体现引领性。因此，处理好“应用性”与“适用性”，关键在于“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以跨学科应用知识生产为体，以动态适配乃至引领区域产业创新为用，二者互为表里、相互赋能。

（二）破解“两张皮”困境：基于“三螺旋”模型的结构性适配

当前，应用型本科在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两张皮”困境：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脱节，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脱节。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线性知识传递模式尚未被根本打破。

在“政产学三螺旋”创新模型中，大学、产业与政府并非彼此孤立的实体，而是相互交织、动态互动的创新螺旋。破解“两张皮”困境，应用型高校必须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

的转变。在专业设置上，一方面要紧密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形成与地方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相适应的学科矩阵，确保人才培养的精准供给；另一方面，要进行内部适切性评估，充分考虑高校自身的历史积淀、师资条件与区域比较优势，避免盲目跟风“热门专业”，防止陷入新的同质化竞争，造成教育资源的低效配置。

（三）构建“三个转化”机制：内涵式发展的微观实施路径

在宏观结构适配的基础上，应用型本科的内涵建设必须落脚于微观的教学与人才培养环节。核心在于构建以下“三个转化”的长效运行机制。

第一，将“产业需求”转化为“育人目标”。应用型本科高校需要打破传统的学年制调整模式，建立基于“敏捷治理”理念的专业响应机制，将行业企业的最新技术标准、工艺规程与岗位需求前置融入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中。2025 年 3 月，教育部部署实施提升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双千”计划，推动全国范围内开设 1000 个“微专业”（或专业课程群）和 1000 个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微专业”突破了传统学科专业的刚性壁垒，具有灵活性高、针对性强、试错成本低、适配度高等特性，应用型本科可以此为抓手，快速对接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战略性人才需求，将其作为破解产教融合滞后难题的有效载体。

第二，将“工程案例”转化为“教学项目”。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依托真实的实践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借鉴国际工程教育领域“构思－设计－实现－运作”的教育理念，将企业正在攻关的真实项目、技术瓶颈引入课堂与实验室，构建基于真实生产和商业环境的“项目制教学”体系。通过全周期的项目式学习，

使学生在解决真问题中掌握知识、习得真本领，实现从“模拟演练”向“实战训练”的跨越。

第三，将“技术经验”转化为“理论知识”。这是应用型本科区别于职业本科的核心特征，也是提升应用型高校学术水平的关键所在。应用不应只是对既有技术的单向使用，更应是知识的再生产。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不仅“知其然”（掌握操作技能），更要“知其所以然”（理解技能背后的科学原理）。高校师生应与行业工程师协作，将生产一线的碎片化“技术经验”进行系统归纳与总结，将其升华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应用型理论”或“行业标准规范”。这种将经验理论化重构的能力，是学生未来面对技术变革时实现知识迁移与系统创新的根本保证。

四、生存之问—直面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突围路径

“双优”建设工程是国家推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重要战略，但应用型本科高校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属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地方本科院校纳入省级人民政府统筹协调管理范畴。一般来讲，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高度依赖于其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关键资源的能力，包括资金、生源、产业技术、政策支持等。应用型本科扎根地方、服务地方，其办学生态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然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强落差”，直接导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马太效应”。如何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宏观格局下实现“双优”建设目标，是关乎应用型本科发展前景的现实之问。

（一）突破区域产业差异下的资源约束困境

认清现实的竞争环境是制定有效生存策略的前提。当前，我国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在现代产业体系上呈现典型的梯度格局。

位于“核心区”的东部，拥有先进的制造业集群与数字经济高地。当地企业资本积累雄厚，技术升级需求明确，既有意愿也有能力投入资源，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合作，校企合作整体呈现良性互动态势。

相比之下，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处于“边缘区”，产业结构以资源开采、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普遍存在研发投入不足、高端人才外流、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当地许多企业自身面临生存和转型压力，难以提供充足资金支持产教融合。如果完全按照统一标准遴选“双优”建设高校，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本科高校将因外部产业环境支撑不足而输在起跑线上。因此，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应用型高校应放弃与东部高校全面对标的跟跑模式，必须另辟蹊径，基于自身资源条件实施差异化的竞争策略。

（二）集中有效资源打造特色优势专业

弱势组织应主动避开与强势组织在主赛道的正面竞争，转而集中有限资源，深耕具有独特优势且被主流忽视的细分领域。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应用型高校难以在办学规模、学科门类、科研经费等方面与东部高校全面竞争，需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其核心策略是放弃“大而全”的综合型发展模式，转向“小而精”的特色化办学。

具体而言，高校应依托所在地的自然禀赋与产业基础，培育具有区域辨识度的“单项冠军”专业。如西部地区可聚焦现代旱作农业、荒漠化生态修复、新能源与矿产新材料等领域；东北地区可聚焦重型装备制造关键部件、黑土地保护与冰雪装备产业等方向。通过将有限的办学经费向这些特色专业倾斜，打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优势学科，

以局部的比较优势赢得生存空间。

（三）构建跨区域的产教融合协作网络

在数字化时代，地理位置不应成为阻断知识与资源流动的绝对障碍。为突破地缘限制，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应用型本科可引入“开放式创新”理念,借鉴职业教育领域“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政策经验，构建跨区域的协作机制。

具体而言，可实施“东部资源中西部转化”的策略。一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的高科技企业建立跨区域协同研发中心，利用 5G 与数字孪生技术，在西部高校建立与东部先进生产线实时同步的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将东部的产业前沿数据接入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教学环节；另一方面，推行跨校虚拟教研室与优质课程资源的云端共享，通过柔性引进东部高水平师资，弥补本地师资力量的不足。通过这种跨区域的产教融合网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应用型本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本地产业资源不足的劣势，实现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与重组。

（四）完善分类分层的多元评价体系

生存突围不仅需要办学实践层面的努力，还涉及如何适应并推动评价制度的改革。建立分类分层的遴选体系，是“双优”建设应解决的制度性问题。国家在制定标准时，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差异，设立不同的赛道。具体而言，对于东部地区的高校，可提高“引领前沿产业升级”“攻克关键技术瓶颈”等指标的评价权重；对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高校，则宜引入“增值评价”理念，重点考核其在“支撑区域传统产业转型”“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的实际贡献。

在申报和建设过程中，中西部及东北地区高校不宜简单以横

向经费总量与东部高校对标，而应立足自身办学实际，客观呈现其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唯有如此，才能推动评价制度真正实现分类分层，为不同资源禀赋的高校争取公平的发展空间。

应用型本科“双优”建设工程的启动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破除结构性“中部塌陷”、重塑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展望未来，随着“双优”建设的深入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若能找准自身生态位，深化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以差异化战略突破区域资源约束，必将成长为支撑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脊梁，与研究型大学、职业技术型院校共同构建起分类清晰、结构合理、功能互补、各具特色的中国高等教育新生态。

参考文献：略。

（来源：2026 年 9 月第 5 期《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关于支持浙江万里学院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行动方案

甬政办发〔2026〕22 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及部省属驻甬各有关单位:

《关于支持浙江万里学院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行动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6 年 7 月 3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支持浙江万里学院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教育强国、教育强省建设，全面落实《宁波市加快建设教育强市实施方案（2025—2035 年）》和《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普通高等学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甬政发〔2024〕51 号）等要求，聚力推进教育强市建设，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教育强国战略，坚持目标引领、改革创新、校地融合，强化精准施策，全力支持浙江万里学院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为宁波打造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城市、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到 2027 年，综合实力位列全国高校 300 名左右，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达到 2.3 万人，硕士学位授权点达到 20 个，在校研究生达到 1800 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达到 7 人，年度科研经费达到 1 亿元，省部级及以上科创平台达到

9 个，学校成功更名为大学，建成省内一流高水平应用型高校。

到 2030 年，综合实力位列全国高校 275 名左右，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达到 2.5 万人，增列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拥有博士学位授权点 1—2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达到 25 个，在校研究生达到 3500 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达到 12 人，年度科研经费突破 1.2 亿元，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平台达到 12 个，初步建成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到 2035 年，学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综合实力跻身国内一流应用型高校行列，基本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二、重点任务

（一）实施党建引领与思政铸魂工程

1. 坚持和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建政治引领，以党建牵引现代治理体系建设，充分释放党建工作在健全体制机制、强化思想铸魂、织密组织体系、彰显政治功能中的赋能作用，推动高质量党建深度融入中心工作、引领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健全完善学校安全工作体系，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筑牢校园党风廉政建设防线，持续巩固“全国文明校园”、省级“5A 级平安校园”等创建成果，涵养政风清明、教风清正、学风清新的育人生态。（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委宣传部）

2. 构建全域“大思政”育人格局。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完善“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日常思政、生活思政”四维联动的育人体系。引领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持续放大思政育人品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到 2030 年，打造一批国家级思政示范“金课”，培育 1—2 个国家级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委宣

传部、市社科联〔市社科院〕）

（二）实施学科跃升工程

1.分层打造学科高峰高原。建设以生物工程为核心的现代农业与生命健康学科群，推动生物工程建成省优势特色学科，构筑学科高峰。支持学校围绕智能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市级优势特色学科，形成学科高原，新增 1 个省一流学科（A 类），工程学、农业科学、植物学与动物科学等学科跻身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全球前 1%。（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科技局）

2.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布局。紧扣宁波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加快布局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学科，设置智能制造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储能科学与工程等本科专业，做强“新工科”；设置生物育种技术、农业资源与环境等农学类专业，做特“新农科”；同步迭代升级人文社科类专业，持续优化专业结构。到 2030 年，新开设理工农医类专业不少于 7 个，理工农医类在校生占比力争 50%以上，全面提升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能力。（责任单位：市教育局）

（三）实施引才汇智工程

1.超常规引育高层次人才。聚焦重点发展学科，加大领军人才、海外优秀人才、行业英才引育力度，引荐一批高水平创新团队；支持学校高层次人才申报省级顶尖人才计划、海外引才专项计划。到 2030 年，新增省部级及以上层次人才 30 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达到 12 人，专任教师博士占比超过 65%。（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市科技局、市人力社保局）

2.建强高水平双师型队伍。选聘“产业教授”“科技副总”，

联合企业共建博士后工作站、专业研究生导师队伍，推动校企高层次人才共育共享。到 2030 年，拥有“产业教授”“科技副总”均不少于 50 名，具备行业实践或博士后研究经历教师占比达到 70%，研究生导师中有行业实践经历的占比不少于 60%。（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人力社保局）

（四）实施产教融合育人提升工程

1.创新“新工科”育人机制。依托余姚校区校企地协同发展优势，面向智能制造、能源材料等领域，联动行业龙头、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建工程师学院，推进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到 2030 年，新增通过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业 3 个，建成市级产业工程师学院 1—2 个，毕业生留甬率不低于 45%。（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经信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余姚市政府）

2.加快“新农科”人才培养。全方位支持宁波现代农学院建设，聚焦生物育种、生态修复、资源综合利用、生物合成开发、智慧农业等重点方向，主动承接国家、省、市“新农人”培训任务，构建完备的“新农科”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到 2030 年，每年培养培训 1000 人次，成功创建国家级乡村振兴优质示范校。（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农业农村局）

3.推动“人工智能+”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探索“人工智能+特色专业”复合育人路径，分层分类开发“人工智能+”智慧课程，打造智能化示范教学场景，构建高素质、强实践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到 2030 年，新增国家级一流课程 10 门，力争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项。（责任单位：市教育局）

4.推进研究生教育扩容提质。重点创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培育生物与医药、智能科学与技术、审计等博士学位授权点。支持学校以卓越工程师培养为牵引，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产学研用”一体化培养模式改革，推动与大院大所名企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打造以实践能力为核心导向的工程类专业学位硕士、博士培养示范点。到 2030 年，获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增列博士学位授权点 1—2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25 个以上，研究生规模达到 3500 名，占在校生总规模的 14%。（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经信局）

5.构筑区域创新创业教育高地。立足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双轮驱动，整合市级创业学院、省级双创示范基地、国家级众创空间资源，高标准建设校内大学生创业园区，以高水平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卓越创业者。到 2030 年，依托宁波市概念验证中心和成果转化中心，成功孵化初创企业 1000 家，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 100 家。（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人力社保局）

（五）实施科创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1.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加快构建协同开放的创新体系，联动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湘湖实验室、微萌种业等单位共建水产动物遗传发育与精准育种重点实验室；支持学校联合“大优强”“专精特新”企业，共建新能源、工业视觉与工业智能、数字孪生与智能制造、农业遗传育种等省级工程研究中心；支持学校面向国家、区域重大发展需求，建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知识产权学院、社会治理现代化创新实验室等新型产权融合创新载体。到 2030 年，建成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平台达到 12 个，争创国家级科研平台、新型特色智库各 1 个。（责任单位：市科技局、

市经信局、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社科联〔市社科院〕）

2.推进高水平科研成果突破。聚焦生物种业、生命健康、工业互联网、能源材料、港航物流等重点领域，联动行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集中攻关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学术论文、标志性科研成果。到 2030 年，新增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5 项，在国际顶尖期刊刊发高水平论文 2 篇，力争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1 项。（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科技局）

3.加快高质量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主动服务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联合企业共建成果转化中试基地，协同开展技术攻关、新品种研发。构建特色鲜明、效能突出的科技特派员服务体系，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到 2030 年，培育通过国家审定新品种 10 个，带动产业经济效益 10 亿元；年度科研经费 1.2 亿元以上，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不低于 25%。（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经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

（六）实施国际化开放办学工程

1.系统提升国际科研协同合作能级。推动学校与海外高水平高校、科研机构共建国际化产学研基地、联合实验室；支持学校加快引进高层次国（境）外专家，拓宽教师国际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出国研修渠道，打造一批能与国际接轨的优势学科团队。到 2030 年，新增国际联合实验室（合作基地）2 个。（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外办）

2.拓宽国际教育交流空间。聚焦中东欧、东盟等重点地区，构建多种形式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设立区域专项来华留学奖学金、研究生层次的专项奖学金，吸引优质生源来华深造。到 2030 年，新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2 个；

外派交换生比例达到 2%；学历教育留学生 400 人以上，研究生层次留学生占留学生规模的 20%以上。（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外办）

三、保障措施

由市教育局牵头统筹市级各相关部门、各区（县、市）政府，共同破解学校高质量发展重点难点事项，强化目标管理与过程评估。加强资源投入保障，对学校成功获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建成国家级科研平台、立项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等事项，按规定给予支持；深化校地合作，支持学校与余姚、宁海等地开展共建，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探索建立工程师人才协同培养机制。支持学校扩容提质，重点推进余姚校区“校园、研发园、孵化园”三园融合新校区建设，校区建设及投用前 5 年相关补助由余姚市政府统筹保障；后续视校区发展情况，在增加建设用地、补助专项经费等方面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同步推进回龙校区扩容提质，推动宁波现代农学院高质量发展。

附件：浙江万里学院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核心目标

附件

浙江万里学院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核心目标

观测点	主要数据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学校排名	全国高校综合实力排名	315	305	295	285	275
人才培养	全日制在校生规模（万人）	2.2	2.3	2.4	2.45	2.5
	研究生占比（%）	6.1	7.83	8.3	11.2	14
	学历留学生数量（人）	150	200	270	340	400
	毕业生留甬率（%）	38	40	42	44	45
学科专业	硕士学位授权点（个）	14	20	20	20	25
	博士学位授权点（个）	0	0	0	0	1-2
	省一流学科（个）	6	6	7	7	7
	ESI 排名前 1%学科数量（个）	1	2	2	2	3
	国家级课程（项）	10	12	14	16	18
	在校生理工农医占比（%）	37	40	43	45	50
师资队伍	顶尖人才（人）	1	1	1	2	2
	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人）	6	7	9	10	12
	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比（%）	52	54	56	62	65
	具有工程经验的教师总数	230	260	280	310	330
科学研究和地方服务	与宁波现代产业体系紧密相关的在校生占比（%）	75	77	80	82	85
	科研经费（亿元）	0.8	1	1.1	1.1	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量（个）	13	16	20	23	25
	省部级及以上科创平台数量（个）	8	9	10	11	12
	发明专利产业化率（%）	22	23	23	24	25
	高校成果转化总金额（亿元）	0.3	0.35	0.4	0.45	0.5

（来源：2026 年 8 月 6 日宁波市人民政府网站）


篤德啟智
勵志博學